

中央亞細亞

第二卷 · 第二期

- | | |
|-----------------------------------|-----------|
| 羅布淖爾考..... | 李長傳 (一) |
| 河套之史前文化..... | 裴文中 (二〇) |
| 特稿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
との服飾の類似に就て..... | 鳥居龍藏 (二〇) |
| 乾燥亞細亞一角的語言系統..... | 錢端義 (三六) |
|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 陳嗣初 (四〇) |
| 明代西茶易馬考..... | 李光壁 (四七)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羅布淖爾考

李長傳

一、舊籍中之紀載

羅布淖爾，我國古稱蒲昌海，鹽澤；其紀載始自漢代。

史記大宛傳云：「于闐之西，則水竹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廓，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

漢書西域傳云：「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

山海經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瀛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注云：「河出崑崙……東注于瀛澤……瀛澤即鹽澤也，亦名蒲昌海。」

水經注云：「河水又東注于瀛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鄴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委頓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邊覆其國，城某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滄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西南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

羅布淖爾考

行人所遇，畜產皆布氍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雲浮，窳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鄴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東去玉門，陽關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淨，冬夏不減。其中洞漚電轉爲驟淪之脈，當其激流之上，飛禽奮翻于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之所潛而出于積石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瀛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海，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

以上諸紀載，同一來源，蓋自漢代張騫使西域以來，得自土人之傳說，並非實地之紀錄。

羅布之名殆始自唐代。大唐西域記有納縛波故國，馬哥波羅遊記有 Lon 城及 Lon 沙漠。但玄奘西去，馬哥東來，雖皆經過羅布淖爾附近，然皆未見淖爾，故其紀載中無關於湖水之事。

清初平定回疆，實測天山南北地圖，對於新疆之地理比前代進步，故對於羅布淖爾之紀載亦較詳。

齊召南：水道提綱（一七六一）云：「蒲昌海即古鹽澤，今曰

洛普鄆模。」注云：「西二十度，極地四十二度三分，在土魯番城南少東三百餘里，直西安鎭西北一千餘里。」又云：「洛普池滄而不流，東西長南北狹，周百餘里。」

滿洲七十一：西域見開錄（一七七七年）云：「賀卜諾爾者，即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關展西至和闐四千里之南，自和闐南至後藏四千里之東，周廻萬里，皆星宿海之海。渺無人烟，間有道路，非戈壁即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耀度。水色赤黃，數其泉不可以萬計，派流莫考，沮洳無垠，無一非夾游夾沙滄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躡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為黃河極大之湖。濼涸冷結，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峰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黃水一綫自山下湧出，如溝渠耳。東北流入中國，即黃河也。有村二處，皆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不牧，惟以魚為生，織野蓑為衣，取天鵝絨為裘，藉水禽翼為臥具。語言與回子通，不解風經禮拜之事。有時至庫爾勒回城者，不能盡食肉食，食即大嘔，以庫爾勒多魚故來，他處則不敢往。其地設五品伯克一員，屬關展大臣管轄，時赴關展謁見，則鯨魚以為糧。」（按此紀載將羅布泊與黃河源之星宿海相混。）

徐松：西域水道記（一八二三年）云：「塔里木河自庫爾勒莊東行二百里，逕哈喇沙爾城南，又東二百餘里，逕博斯騰淖爾南，又東入於羅布淖爾。回語謂羅布者匯水之區。吐魯番回語傳云：羅布淖爾

鄆吐魯番為巨澤，塞爾羌喀什噶爾諸境水六十餘匯之是也。……河源紀略云：羅布淖爾為西域巨澤，其地在西域近東偏北，全受西偏崇山水，共六大支，綿地五千里，經流四千五百里。其餘沙積限隔，潛伏不見者無算。以上勢揆之，廻環紆折，無不趨歸淖爾。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冬夏不盈不縮。極四十分至四十五分，西二十八度十分至二十九度十分。其受水之口今惟一處。水經注以為北

南二河，各自注澤。余按漢書分兩道顯言南山北山，不見分波南北河之文，知一川渠並，振古如茲，鄙君所說，容有未審。大淖爾之旁有小淖爾環之，北則圓淖爾三無名，南則方橋淖爾四：一曰鄂爾溝海圖，一曰巴哈噶順，一曰塔里木池，一無名，地當哈喇沙爾城東南五百里，吐魯番城西南九百餘里。……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阿果毅公剿沙拉瑪呼斯追擒巴雅爾道經淖爾，奏言：臣於二月初九日至羅布淖爾，地甚寬廣，林木深密。有回人頭目哈什哈等投見，據稱：伊等現有六百餘人，以漁獵為生。四十年前，大兵平定吐魯番時，將軍曾經招撫，賞給緞布茶葉。撤兵之後，為準噶爾所據。近聞平定準噶爾，前年進貢仙鶴。臣等詢問羅布淖爾通達何處？哈什哈告稱：此水甚大，周行須兩日餘。準噶爾之葉爾羌，喀什噶爾等六十餘河皆匯於此。臣等沿途登高瞭望，不見涯岸，今大兵兩路進剿，恐將來有鍾逃賊業。隨查明戶口，歸併額敏和卓管轄。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參贊舒文讓公以羅布淖爾凡兩部落：一為哈喇庫勒，一為哈喇和卓，而哈喇和卓又區為五，惟喀喇庫勒一伯克約束羅周，增置伯克三人轄其

衆，歲納哈什翎百枝，海倫布九張。其人食不食五穀，以魚爲糧，織野
羸爲衣，取麕毳爲裘，薪水禽鷺爲臥具，言語與諸回不通。今其族
凡二百八十戶，男女二千二百六十餘口，五品伯克三人六品伯克七人領
之，改制惟貢馴皮九張，每歲吐魯番郡王遣屬受其貢。路由吐魯番城
南三十里哈喇二工屯田而南，又西南五百餘里經庫穆什大澤東，又南
出山（註云：自吐魯番至出山處，凡六日行），山陽平沙無人。又三日
至小涼爾北岸，舉火爲候，涼爾中間人以木筏來迎。小涼爾寬數里，
達其南岸。沙地曠遠，海氣鬱蒸，胡桐叢生，結成林菁，即羅布涼
爾北岸也。郡王取其貢達於吐魯番領隊。涼爾東通燉煌，肅州。新志
云：自沙州之哈喇涼爾正西小徑，達羅布泊計程不及一月。……涼
爾水伏流東南千五百餘里，湧出於巴顏哈喇山之麓……」

試觀清代記載，已確定羅布涼爾之名稱。對於羅布涼爾之位置，
地理景相，入湖水道及湖中居民，皆有比較詳細之記載。至所謂羅布
涼爾潛行地下，至青海之星宿海更湧出而爲黃河之源者，則由於當時
邊疆地形尙未經科學的探測，故一般學者仍迷信漢代之記載，不足深
責也。（註）

（註）據近年西洋探險家之實測，羅布涼爾高八二〇公尺，而星宿海之高
度四三〇公尺，羅布涼爾之水無逆流而上之理。但近人著作如新編
遊記，古今治河圖說，仍有星宿海之說者。

二、新探測之成績（註）

對於羅布泊作科學的探測而從事研究者，則自近年西洋探險家爲
始：

一八七六—七年，俄人普什華爾斯基 (Pryvalsky) 至新疆探
險，發見塔里木河注入之喀喇布朗 (Kara Bouran) 及喀喇庫順 (Ka-
ra Koshan)，謂即中國之羅布涼爾，在中國地圖羅布涼爾南，而
指稱中國地圖之錯誤。當時在中國之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Rich-
thofen) 不以爲然，李氏以爲中國地圖皆經實測，非閉門臆造者，決無
相差一度之理。且羅布涼爾爲容受湖，水爲鹹水，而喀喇布朗，喀喇
庫順則爲淡水，當係另爲一湖，非中國歷史上之羅布涼爾。必另有一
支流入舊湖，而爲普氏所忽視也。

普氏以後之探險家，爲俄國之科斯羅夫 (Koslov)，則附和普氏
之說，莫人斯坦因 (Stein) 亦從之。瑞典典斯文赫定氏 (Sven Hedin)
則贊同李氏之說，美國亨丁頓 (Huntington) 則謂因氣候變遷之故，
原有內陸大海逐漸乾涸，僅留北部積水，成一小湖，後因水量增加，
又成一大海。經二次乾涸，僅留南部一湖云。

一八九三—七年，赫氏誓欲考查此事，自庫爾勒沿孔雀河探其究
竟。見孔雀河東南流，初洩入淺澤，名馬爾塔克庫爾 (Marta Kolo)，
繼復洩出，受塔里木兩小支流之水，土名孔雀吉什塔里木 (Korala
Kish Tamin)。又東南流名伊頓克河 (Ilek)，洩入一湖，南北長而

東西狹，蘆葦蒼蒼，頗爲茂密，常有漁夫往來其間。湖分爲四泊：名阿夫盧庫爾(Avulu Kol)，喀喇庫爾(Kara Kol)，台雅克庫爾(Tayek Kol)，阿爾喀庫爾(Arka Kol)。湖位於北緯四十度三十分，以爲即中國地圖之羅布淖爾。

喀喇布朗及喀喇庫爾，赫氏亦沿舟其間。在普氏遊時面積甚大，由阿不且莊(Akai)即可舟行至喀喇庫爾之漁村，赫氏遊時，在普氏後僅十一年，舟行二日，已不可通，泊中荻葦充塞，昔日漁村，多已棄脫。喀喇布朗舊時之浩如海洋，一望無涯，今則漸就淺狹，舟行時須浮滯，即在夏日雨量稍多時，亦不能復昔日浩淼之鉅觀。湖濱綠草蒙茸，已變爲瘠荒人之牧場矣。

阿不且莊之昆策汗伯克(Rashikhan)，時年已八十，其父祖皆爲伯克，皆年九十始卒。昆策汗告赫氏，其族本居北部羅布淖爾，迨其大父二十歲時，塔里木河改道南流，喀喇布朗諸泊水始大增，其家亦遂南徙。阿不且莊乃其大父所立，以時推之，當在一七二〇年間。羅布居民自稱羅布人(Lapik)，善造獨木舟，大者長至二十六呎，寬二呎半，無帆蓬，進行時皆藉槳楫。

一九〇〇—一年，赫氏復往羅布淖爾探險，實測孔雀河下流之庫魯克河(Kuruk-Daria，乾河之意)，見此乾河床幅百公尺，深四、五公尺。又越羅布沙漠，至喀喇庫爾，見比四年前更狹小。此行最大成績，在沙漠北邊發見樓蘭城故址。赫氏從事發掘，發見古代木簡書件甚夥，最早爲一五〇年之物，而多爲一一八至二七〇間之記載。故

知紀元三世紀中最高繁盛。當時之記載中有文云：「史願留矣，口口爲大澤地深大又來水少，言十日末左右已達樓蘭」。赫氏以爲樓蘭附近之庫魯克乾河床，在樓蘭全盛時必浩瀚汪洋也。

赫氏又實測樓蘭之窪地，比喀喇庫爾爲低，而推測他日河道必改道北返，北部窪地，將復淪爲湖。赫氏之說，以爲新河道河水下流夾有泥沙雜物，年深日久，勢將河床墊高，而乾涸之河床則爲當地流行之東北烈風所吹颺而低平。如此進行，至一定之歲月，乾河床必較低下，而以自然趨勢，不得不改由原道流入舊泊也。

一九〇六年斯坦因由緒光沿塔里木河下流至樓蘭探險，發見赫定所測塔里木河洪水泛溢北流所成之新無口大湖，已完全乾涸。斯氏至樓蘭從事發掘，而發見樓蘭之原音爲Kroraina。

一九二八年赫氏率西北科學考察團赴新疆，至吐魯番時，遇商人土克塔阿潭(Tokta Akhun)，赫氏詢其至緒光之道。彼云每年赴孔雀河畔之鐵干里克(Kichenlik)販羊至土魯番，而在營盤(Yingpan)渡河。赫氏大異，謂三十八年前營盤乃係沙漠，阿潭則謂七年前即一九二一年，孔雀河已由此而入庫克河。赫氏乃命團員那林(Alan)往探，庫魯克河果已恢復河道。一九三〇年赫氏又命德國團員漢納(Hann)及中國團員陳宗器往測新湖，乃證明其推測之證實。

一九三〇—三一年，漢納及陳宗器自敦煌西行經榆樹泉，五棵樹入羅布盆地，經羅布淖爾乾涸之海，而抵新羅布淖爾。此故海爲鹹灘，乃古代海底，爲史前塔里木盆地之鹹海。當時海之面積遠較現在

爲大，其東部有大海灣。現在羅布淖爾四周之鹹灘，約有三萬七千方里，較現在之羅布淖爾有四倍之大。其海底之鹽鹼，經多次乾涸與水漲而溶化，與烈風颳來之泥沙相固結，聚成極不規則之地面。鹽灘堅硬，駱駝有傷其足者，旅行甚艱苦。經過鹹灘凡一百三十里程，而達新羅布淖爾東岸。

新羅布淖爾面積有九千五百方里，略作葫蘆形，南北縱長一百七十里，南北闊四十里至九十里。其位置海之南岸爲北緯三十九度至五十八分。河水入海之處在海之西北角，河口與其河洲有多數之小島，爲夏季野鴨天鵝育雛以後教習游泳之所。全湖周圍約六百五十里，步行一週須時約旬日。因所含鹽分過多，經冬不結冰。在河口近海之處，雖略帶鹹臭之味，若煮沸尙勉強可飲。

在羅布淖爾西距海北部三十里外之區域，爲鹹灘與沖積層分界處。沖積層在古代水涸之後，成爲廣大之平原，因爲烈風所侵蝕，乃構成兩種地形，一名邁賽 (Mesa) 一名雅丹 (Yardang)。前者高十公尺至三十公尺，年代較古，後者高不滿一公尺，年代較淺。其凹處爲烈風所侵蝕以去，作北東北—南西南方向，與當地流行之風向相同。

新羅布淖爾多量之水，悉出孔雀河所供給。水源出焉魯之海都河，初入博斯騰淖爾，復排出，經庫爾勒而東，經尉犁，營盤，德門堡，至樓蘭故址附近入新羅布淖爾。以前之故道，入塔里木河，下流爲乾河，即一九〇〇年測定實測之庫魯克河 (乾河之意)。自一九二一年

在德門堡地方離去故道，始再有水。其自尉犁至德門堡一段，沿河長四百七十里爲老河，以東則爲新河。當地土人稱前者爲孔雀河 (龍河之意)，後者爲庫穆河 (Kum Daria, 沙河之意)。

羅布沙漢指環羅布淖爾四周不毛之地，東西長達六百里，南北亦闊二百五十里。東至古乾海之東岸，西迄孔雀河南行之故道，與塔克拉馬干沙漠分界，南達庫穆塔格沙漠，北迄庫魯克塔格山麓。此沙漠之東部爲堅固之鹹灘，西部爲沙丘，偏北之部則因爲風剝蝕所遺留之土阜或高地，即漢代所謂白龍堆，中部則羅布淖爾所在地也。

羅布人 (Loplik) 爲回回，而混有蒙民之血統，信奉回教，語言與回同。所居係草棚 (Gutina)，僅足蔽風雨。所衣係用羊毛自織之布，僅足蔽體。所食魚類酸乳等，不能求一飽。西部幾千里克一帶之居民，雖生活較好，兼營農耕，而真正之羅布人則以漁獵爲生。以是常築草棚於沿河各小湖之旁，以捕魚打野鴨採天鵝蛋爲生。亦兼營畜牧，多綿羊，爲西部富家所寄養，彼等略得酬勞而已。羅布人對人彬彬有禮，與回同，但較爲直率，豪爽，獨立，自尊，好賓客云。

(註) 據 Hedlin: *Through Asia*, 1899; Hedli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1903.

Huntington, *Pulse of Asia*, 1907; Stein: *Innermost Asia*, 1928;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

Hedlin: *Across the Gobi Desert*, P. 340-92, *Lop-Nor*, 1933. (考

長傳譯羅布泊考，新亞細亞第十卷第五號) Höner: *Lop-Nor*.

Top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Summary, Geografiska Annaler, 1932
 Horner and Parker C. (Chen, Alternating Lakes, Geografiska
 Annaler, 1935. (李良驥譯：中國西北之交舞湖，方志月刊第八卷第
 四五合期)，陳宗器：羅布淖爾與羅布荒原，地理學報第三卷第
 一期，一九三六年。

三、結 論

綜覽中國之舊紀載及新探測之報告，進一步討論之如下：

羅布淖爾之古名爲鹽澤，蒲昌海，湖澤，輔日海，牢蘭海，臨
 海。鹽澤者，因爲鹽湖故也。蒲昌海之意義不詳，唐代曾置蒲昌城，
 殆山蒲昌海而得名。伯希和謂此蒲昌乃塞 (Saka) 語 Phucanni 之
 對音 (Toung Pao 1931, p. 139-40)，但與蒲昌海是否有關不詳。湖
 澤者，形容湖水色黑之意。輔日海殆爲蒲昌海之誤。牢蘭者，因隸蘭
 而得名。臨海殆爲鹽海之誤。

羅布淖爾近代之命名則統一。普洛池，賀卜諾爾，羅卜諾爾，羅
 布淖爾，羅布泊，同爲 (Lop-Nor, Lab-Nor) 之譯者。按羅布者，回
 語鹽水之區，淖爾者，蒙古語湖泊之意，同人則稱湖曰喀喇 (Kara)
 或庫勒 (Kul)，此名爲漢人所命名，土人則無此稱謂也。羅布既爲鹽
 水之區之意，故同人每汎指塔里木河下流諸湖爲羅布。如孔雀河及塔
 里木河下流之土人自稱羅布人 (Qalik)，今喀喇布郎西尚有羅布莊及
 羅布驛。喀喇布郎及喀喇庫順南之蘇羌 (SharKhik) 及麼朗 (Miran)

據斯坦因之說，西藏人稱後者曰大羅布 (Noi Chung)，前者曰小羅布
 (Noi Chen) 云 (Stein: Serindia, Vol. I, p. 461-470)。羅布之名
 最早之紀載，見於馬哥波羅遊記中之 Lop 城及 Lop 沙漠。再上
 溯爲大唐西域記之納縛波。據伯希和氏 (Pelliot) 之說，納縛波爲
 梵語 Navaya 之對音，爲新國之意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Tome VI, p. 81)。但此恐與近代羅布之名
 無關。

就地理之背景言之，塔里木盆地之水，由東流入羅布盆地，而瀾
 爲湖泊，即羅布淖爾。此盆地北抵庫魯克塔格山 (Kurd Tagh)，南
 抵阿斯騰塔格山 (Asin Tagh)，東抵北山，而與甘肅西部相連。盆
 地大部分爲沙漠，稱羅布沙漠，其中部爲古鹹海之遺跡，成鹽質地。
 古鹹海之東南稱庫魯塔格沙漠 (Kun Tagh Desert)，惟有古鹹海之
 南端羌一帶及塔里木河下流兩岸略有農耕地。自塔里木河注入羅布盆
 地之大水有三：中爲塔里木河，北爲孔雀河 (上流海都河)，南爲且
 末河 (一稱卡塔河)。三河下流分合不常，故所瀾之湖泊時有迁移，
 或南或北，或爲鹽湖，或爲淺澤。

羅布盆地北之鹹灘地域爲有史前之內海，即古蒲昌海所在地。其
 証有二：一，史記漢書謂蒲昌海一名鹽澤。史記索隱：鹽澤，鹽水
 也，故其水必爲鹹水。水經注謂蒲昌海在龍城 (疑即漢書之龍堆) 之
 西南：「地廣千里，鹽而曬堅，行人所避，畜產皆布匹臥之，掘發其
 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聚」，即指鹹灘沙漠之景象。二，史記

謂樓蘭，姑師（即車師今吐魯番境）豈有城廓臨鹽澤。水經注謂蒲昌海在鄯善（即樓蘭）之東，龍城之西南，其位置正相符。但有史後之鹽澤比之有史前之鹽澤，面積大為縮小矣。

蒲昌海之水源，以漢書記載最簡明。漢書西域傳謂于闐河（今和闐河）與葱嶺河（今塔里木河）合注蒲昌海，與現在之情形相合。但北魏鄯道元之水經注則謂河水（指塔里木河）有南北二河，同注鹽澤。今節引如下：

「南河又東經于闐國（今和闐）北，又東北經于闐國（今克里雅城）東，東經精絕國（今安德悅）北，又東經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其水北流經且末南，又北經且末城西，且末河東北流經且末北，又東北流而左會南河，合流東逝，通為注賓河。又東經鄯善國北，其水東注澤，在樓蘭國北杼泥城（阿不且北），彼俗謂是澤為牢蘭海也。

「北河經疏勒城下，又東經莎車國南，又東經渭宿國南，又東經姑墨國（今阿克蘇）南，姑墨川入之，其水又東南流，右匯北波河，又東經龜茲國（今庫車）南，又東左合龜茲川（今渭干河），又東右會敬夢之水（今海都河），河水又東經墨山國（在今哈喇蒲東境）南，又東經注賓城（今古拉斯克莊東之東都拉里左右）南，又東經樓蘭城南，又東注於濁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

「北河自歧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經屈茨（今庫車）龜茨（今焉耆）神善（即鄯善），入牢蘭海是也。」

羅布神廟考

水經相傳為漢桑欽（三國時人）著，北魏鄯道元注。據此則三世紀至五世紀間，塔里木河有二河，北河即今塔里木河，南河與北河平行，略沿塔克拉馬干沙漠之南緣東流，合今且末河與北河合，同注鹽澤即蒲昌海或牢蘭海。

此說頗令人可疑。塔里木河在古代本為一水，後分為二水，嗣後又併為一水。此種大變遷，何以在今日地文上無痕跡可尋。且除水經外，亦無其他文獻可徵，其所謂南河所經，歷代旅行家經過者不少，何以絕無論及者，故此說不易成立。

徐松氏謂，漢書西域傳載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至沙車為南道；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波河乃循河之意，派塔里木河而行也，水經注遂附會為南北二河（見徐著漢書西域傳補註）。此說頗可採取。

鹽澤何時南徙，可由辨定所發見之樓蘭古城之盛衰考證之。此樓蘭是否古樓蘭國都，尚為學界爭論之問題，但不問是否樓蘭國都，或為樓蘭一要城，當時位置固沿鹽澤也。一九二二年日本橋本超在此城探險，發掘前涼李伯文書有「到此海頭達海頭」，橋本超遂稱其地曰「海頭」（見中亞細亞探檢九八頁），此海即指蒲昌海而言。橋本氏據其發掘之資料，以樓蘭城全盛時代在第三世紀；自第四世紀時始衰落，則鹽澤之南徙，當在第四世紀以後。第四世紀末法顯西行經鄯善，其法顯傳謂：「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可知已不繁盛。玄奘大唐西域記謂：「自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末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

即樓蘭地。」釋迦方志謂：「自沙州（今敦煌）西南入磧七百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亦名鄯善。」則唐代樓蘭業已荒廢矣。

樓蘭之荒廢，據赫定氏說，當然有政治軍事理由，但重要之原因，則為河道之南徙。河道南徙，湖泊亦隨之南徙。然則徙於何處乎？考近代羅布淖爾南徙有兩位置：一在北緯四十度三十分，即清初紀載之羅布泊，亦即赫定於一八九七年發現之塔里木河下流諸小湖之所在地；一則為一八七七年普什華爾斯其發見之喀喇布朗，喀喇庫順。著者以為羅布淖爾初自鹽澤南徙者，當為前者而非後者。緣一八七二年馬哥波羅東行時，經過羅布城羅布沙漢，依其遊記之行程考之，其所指之羅布城，當為鎔光（Yule: Marco Polo, P. 104-106, 187. note），但遊記中絕未提及湖水之事，可見當時之羅布淖爾不在喀喇布朗也。

十八世紀間羅布淖爾確在北緯四十度三十分間，西城水道記謂登高瞭望，不見崖岸，而土人謂周行須兩月餘，雖不免誇大，但其面積較之一八九七年赫定探測時為大，可以斷言。按赫定氏所見之喀喇庫順，當即西城水道記之喀喇庫勒。據赫定氏之說，同時南部之羅布淖爾業已存在，其後喀喇庫勒等湖縮減終至消滅，而喀喇庫順亦由擴大而縮小，羅布淖爾終北返至鹽澤故址，成今日之新湖。赫定據土人之說，新羅布淖爾於一九二一年北徙，此年代不正確，其北徙年代當在前此十年也。據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東方學會出版之新疆全省輿地全圖，塔里木下流會孔雀河，又東南流與卡德河同注羅布淖爾。

此羅布淖爾西有羅布莊南有鎔光，而阿不且莊即在南岸。依其緯度視之，恰為喀喇布朗及喀喇庫順。孔雀河下流一支南會塔里木河，一支東分，經營盤南名洗溪河，又東瀾為孔雀海，其緯度與今日之新羅布淖爾相同，形態亦相似，惟面積較小。清宣統間修之新疆圖志水道志，述孔雀河水道亦云：「孔雀河原出博斯騰淖爾……西流經庫爾勒莊北。……東南流逕對墩城南。……又東折而南流至沁庫爾莊，渭干北河自西來注。又東南流至古斯拉克莊東南，舊有塔里木河下游支津曰古斯拉克自西來注，今已涸，惟分支東南流入鎔光境瀾為孔雀海。又東南流二百里至鎔光夜密蘇莊北，有塔里木河支津曰阿拉鐵里木河自西來注。又東南流一百二十餘里至阿拉罕受乾河小水入塔里木河。」則洗溪河為庫魯克河，孔雀海為新羅布泊無疑。赫定於一九〇〇年在營盤，謂庫魯克河為乾河，後據土人之說謂一九二一年始復成河。但據新疆圖志道路志二云：「營盤海子，西南四十里洗溪河，渡河東南行四百三十里羅布村。」又云：「洗溪河即海都河下游，水寬多蘆，行者至此舉火，南岸土人見煙來迎，列胡桐樹為棧，廣一二尺，聯數棧以渡，呼曰卡盆，循洗溪河北岸正西行荒曠無人。」此可見庫魯克河（洗溪河）在一九一〇年間已有水矣。

但此尚有一疑問，赫定氏於一九〇〇年發見樓蘭，目視庫魯克河為乾川，而斯坦固於一九一五年至樓蘭，何以未言新湖之事。須知斯坦固為主張羅布淖爾在南部之一人，羅布淖爾之移動問題，赫氏深加注意，而斯氏則漠然視之也。試觀斯氏西域考古記，其論及塔里木河

之變動有云：

「樓蘭」緊鄰遺址地方，自從中國放棄以來，河水常常暫時回漲不時。……遺址自棄置漢中後歷時一千六百年，河水漲落的程序並不一定，各處的情形都是如此。在那些已經死去的紅柳叢同蘆葦塘的低地裏，偶爾這裏那裏露出水來，唯一的水源只有乾河。事實上當我於一九一五年回到沙漠中的庫魯克河時，更在西邊庫魯克塔格山麓，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那條河床，在河床低陷處略掘小井，便可以得到鹹水。我第四次旅行塔里木盆地（一九三〇—三一年）得知最近水文方面大起變動，影響到塔里木河道。夏季水漲大部份的河水流入北方的孔雀河，這樣使兩河合流斜逸，再行灌入乾河川流向古樓蘭地方，此事我覺得全不足異了。」（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〇六—七頁）

庫魯克河的復流，羅布淖爾的移動，赫定氏以為係地理上莫大驚人的發現，而斯坦因則以滑稽淡寫出之，其對於孔雀海之新成，不加注意，甚至諱言，殊不足為異也。

總之，羅布淖爾之變動可得而言者，古代北河（塔里木河）南河（且末河）同北注鹽質地瀾為鹽澤。自第四世紀後南徙位置不明，但十七八世紀時確在北緯四十度三十分間，面積頗廣，即清初記載中之羅布淖爾。十八世紀後且末河更南徙注入喀喇布朗，喀喇庫順，即清末記載之羅布淖爾。至一九一〇年喀喇庫順縮小而中部之羅布淖爾乾涸，塔里木河復北徙注入孔雀河下流稱：淡河或庫魯克河，東入鹽澤故址，瀾為孔雀海，即今日之新羅布淖爾云。

〔筆者：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河套之史前文化

裴文中

(一) 舊石器時代

(甲) 黃土底部礫石層中之石器

(乙) 河套文化期 / 舊石器時代中期

(丙) 舊石器時代之零星發見

(二) 新石器時代

(甲) 細石器文化

(乙) 彩陶文化

附：本文之重要參考書目

〔河套〕，又稱鄂爾多斯，即內蒙古之伊克昭盟（註1）。河套

地方，土地肥沃，自遠古以來，久為人類寄居之福地，故其地之史前遺址甚多。惜國人對其地不甚注意，所知頗少。民國十二年時，法國

神父桑志華 (Père E. Jaen) 及德日進 (Père P. Teilhard de Chardin) 二氏，以三聖宮 (St. Jacques) 天主教堂為根據，在河套地

方，從事考古及地質調查工作。其後桑德二氏，又續至其地數次，發見舊石器時代及新石器時代之遺址及遺物甚多，實為我國研究史前學

者之重要材料。現就二氏已研究及未研究之材料及他人所得之材料，重加整理，就著者所見，為文如下。

(註1) 河套本非一定之政治區域，約指黃河轉曲以內，及長城以北之塘

城而言。本文中所謂各地，頗多在現時之寧夏及陝甘北部者，若按自

然地理之區分，亦可列於「河套」之內。

(一) 舊石器時代

(甲) 黃土底部礫石層之石器

〔黃土〕 (Loess) 為第四紀中期之風成堆積，分佈於黃河流域，

陝甘豫諸省。至河套地方，則在黃土區域之北，由南而北，黃土漸

次減少，而代以砂質黃土或河湖堆積。但在河套之南部（即陝甘之北

部），期間有甚厚之黃土，與其他區域者性質相同。黃土之底部，普

通皆為一礫石層 (Basal Conglomerate)。蓋當黃土生成之前，中國

北部或為一雨量較多之時期，水流沖積，而成此礫石層。礫石層生成

之時，氣候適宜，故寄居於陝甘區域之人類頗多。至黃土生成之時，

氣候乾燥寒冷，不宜於人類之生活，故人類漸次移徙於河套。

黃土底部之礫石層中，至今所發見之石器尚少，不足確定其在文

化上之價值，故尚難定為一文化時期。茲將吾人所知，就河套區域之

零星發見，分述如下：

(1) 準高爾河流域 民國十九年時，德日進及楊鍾健二氏赴陝

當調查地質，曾於河套之東部，準葛爾河流域（現陝西省北部），山黃土底部之礫石層中，採得石器數件，均爲石英岩礫石打擊而成，甚爲粗獷，當爲舊石器時代之遺物。其後民國二十一年，二氏重遊其地，又採得石器數件，與前採者相似。同時二氏又於山西之保德及陝西之吳堡，亦由黃土底部之礫石層中，採得同樣之石器。

(2) 油坊頭 油坊頭在榆林西南，長城附近，現已劃於陝西轄境之內。桑志華及德日進二氏，於民國十二年時，山油坊頭附近，黃土底部礫石層中，採得石器數件，亦爲石英岩礫石所製，如削刮器及扁圓器等。

(3) 甘肅慶陽（註2） 民國九年之時，桑志華於甘肅慶陽之北，山黃土底部礫石層中，曾採得石器數件，與上述三地者相似。以發見之時間而論，此爲中國舊石器時代之石器發見最早者。

以上所述三地點之石器，均皆相似，且發見於相同之地層中，當爲一種人類所遺留之物。計其石器之特點有三：一、同用石英岩（約爲寒武紀以前時代之岩石）礫石（即河水磨光之圓石）製作石器；二、製作之法，同將礫石打擊使破，再沿一邊緣繼續打擊，成扁圓形，或成一邊之削刮器，即行使用；三、多爲石核（Nucleus）製成之石器，石片（Flake）石器甚少。（此或因所發見者尙少之故。）

上述各地之石器，當爲黃土生成時期以前，底部礫石層生成之時，在此河套區域寄居之人類所遺留。論其地質年代當爲更新統中世（Middle Pleistocene）之初期。此種人類在陝甘當據諸省或分佈甚

廣，惜至今尙無發見。至就文化而論，當爲舊石器時代中期（Middle Palaeolithic）之初，或相當於周口店第十五地點時期。惜至今發見尙少，不能確定爲一文化期耳。

（註2）甘肅慶陽，就政區分而論，實隸劃入河套區域。但石器發見之地，在慶陽之北，據黃土分佈而論，實爲黃土區域之北邊，再北則爲砂質黃土矣，故其地亦可勉強列於河套區域。更加所發見之石器，與其他二地者相同，實不能不歸於此。

(乙) 河套文化期——舊石器時代中期

「河套文化」(Ordos Industry)，爲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期（Middle Palaeolithic）文化之代表者，因發見於河套地方，故名。且此種文化，在地質時期中，佔一特殊之階段，即更新統（Pleistocene）之中世，又以史前時期論，則謂之爲「河套文化期」。

在河套區域，山南向北，黃土堆積，漸次變爲砂質黃土及河灣堆積（Sandy loess and lacustrine deposits），已如上述。真正黃土中之化石及人類遺物，發見者至今尙少；惟河套之砂質黃土中，則頗多。著者推測其因，概爲黃土時期，在晉豫陝甘之中南部，氣候乾燥，北風吹來，黃色微塵，瀰滿天空，有如今日北京冬季之情形，即當時黃土生成時之現象。是以人類生活不甚相宜，至少有一部分之人類，漸次北移，而遷至河套。當時河套之氣候，雖未必同樣寒冷，但雨量較多，狂風較少，其地自勝於陝甘南部。若著者此種推測不

誤，則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之遺跡，於晉豫陝甘之真正黃土中求之，自不可多得；反之，若於河套及其附近求之，則希望可無限也。

(1) 發見之經過及地點

桑志華及德日連二氏，於民國十二年，至河套地方，作考古及地質之研究，其結果則發見中國舊石器時代之文化，推翻前人謂中國境內無舊石器時代人類寄居之說。二氏之發見，及其工作，在學術上之價值甚大。民國十二年後，桑德二氏又至其地者三次，每次皆雇工數十名，正式開掘，其地層之研究，甚為詳盡，所獲之標本極多。現二氏所採之標本，一部保存於法國巴黎國立天然博物院；(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一部保存於天津北疆博物院 (Musée de Hoang Ho Pai Ho) (註e)。

計桑德二氏，在河套區域中，所發見之舊石器時代之重要地點有二：一，為水洞溝，在寧夏東南，阿善烏拉山之東北麓，現劃歸寧夏省境內；二，為沙拉烏蘇河之兩岸，小橋畔附近(註4)。二地附近之第四紀堆積物，或為黃土或為砂質黃土，或為河湖堆積。其區域約皆在黃土區域之北緣。

(註3) 現已改為地質生物研究所 (Institut de Géologie)。桑志華曾於白因老遺址，現居法京。

(註4) 沙拉烏蘇河又名無定河或紅柳河。小橋畔在陝西靖邊西北，現劃歸慶陽境內。

(2) 地層及化石

水洞溝者，桑德二氏指紅山堡及清水營二地間之區域而言，適在長城之南。其地有小河，河之兩旁，有二十公尺及五十公尺之階梯，二十公尺之階梯為黃土堆積所成。此地之黃土，一部甚為純粹，一部含有細砂，二部漸次變化，當為同時期之堆積物。

桑德二氏於純粹之黃土中，發見人類寄居之地，均為薄層，或一層或二層，各地不同。此薄層中，含石器甚多。發見之地層，均在黃土底部礫石層之上，其時代當較礫石層中之石器較晚。借此地之化石甚少，且多不完整，與沙拉烏蘇河地點之比較，實皆賴地層之位置。

沙拉烏蘇河之兩岸，多沙丘及河湖堆積，真正黃土則缺乏。但由此地至油坊頭之途中，可觀察由黃土漸次變為河湖堆積之現象。桑德二氏對此觀察，頗自信其正確無誤(註5)。由此觀察，可證明沙拉烏蘇河兩岸之河湖堆積，與黃土為同時之堆積，惟其「相」(Fauna)不同而已。

沙拉烏蘇河兩岸之河湖堆積，或二十公尺及三十五公尺之階梯。桑德二氏於三十五公尺之階梯下部，發見富有化石之層甚多。化石之保存完好，惟石器較少，適與水洞溝之情形相反。據桑德二氏之觀察，沙拉烏蘇河之河湖堆積，漸次變為黃土，此地產化石之地層，其年代當與水洞溝產石器之地層相同。

以上二地所產之化石，皆由布勒 (M. Boule) 及德日近研究。重要之種類如下：

象 (Elephas or namadicus)

披毛犀 (Rhinoceros tichorhinus)

河套扁角鹿 (Cervus doszhanus)

王氏水牛 (Bubalus wansiocki)

洞穴獵狗 (Hyena spelaea)

轉角羊 (Spirocerus kiakensis)

野驢 (Equus hemionus)

赤鹿 (Cervus elephas)

以上各種化石，保存均甚完好，且常有全身骨骼完整無缺者。上述各種之中，除野驢及赤鹿外，均為已絕滅之種。現代尚生存之動物，除野驢及赤鹿外，種類尚多。就其化石群之總合性質而論，其年代當為更新統中世 (Middle Pleistocene)，與黃土中所發見之化石群，年代相同。

(註5) 近數年來，德日進對此觀察之信心漸減，謂沙拉烏蘇河岸之河湖堆積，或較晚於黃土時期。

(3) 人類化石

由上述河套之史前遺址，桑德二氏發見之人類化石甚少。計確與前述之化石同一地層中發見之人類化石，僅有一門齒 (發現於沙拉烏蘇河)。此古人類之門齒，由步達生 (Davidson Black) 研究。步氏認為此齒約為七八歲之兒童者，為鑿匙典型 (Shovel-shaped Type) 者。因所發見之材料甚少，由人類化石之研究，其結果頗不重要。

(4) 石器及骨器

河套之史前文化

桑德二氏由水洞溝及沙拉烏蘇河，所採之文化遺物，由步日耶教授 (Prof. Henri Breuil) 研究。惟步氏對於沙拉烏蘇河所採之碎骨，多認為骨器，雖尚無專文發表，但曾於有關之論文中，一再說明。就吾人所見，此種碎骨實多非人力破碎者，即或有之，亦未必為製作骨器而破碎之者。至真正之骨器，僅有一件，上有菱形刻劃之溝，其用途不明。此骨器發見於沙拉烏蘇河，但其發見之地層，則不能確知。

至於石器，則製作之原料概為石英岩，僅於沙拉烏蘇河發見少數之燧石 (Chert) 石器。石英岩之顏色，約為褐紅色，灰白色及灰綠色，為寒武紀以前，五台系生成之岩石。製作石器之時，亦多採用礫石，或因此區域中，無其他式樣之原料。製作之法，多將礫石打成石片 (Flakes) 或長石片 (Lames)，然後加以修理，使成器具。使用石核 (Nucleus) 者頗少。按形狀論，其重要之石器如下：尖狀器 (Pointes)，與歐洲之莫斯特時期 (Mousterian) 者相似；長刮器 (Crabrois)，與歐洲之奧瑞那時期 (Aurignacien) 者相似；雕刻器 (Burins) 及各種之削刮器 (Racloirs) 等。

據步日耶教授之意，總觀石器之製作方法及石器之型別，一部似歐洲之莫斯特時期者，又一部似奧瑞那時期者，其文化當介乎二者之間。

按著者之意，此種石器之全體性質，實難與歐洲任何文化期者相比較，因原料不同 (歐洲多採用質純之火石 Flint) 製作方法自異，所成之型式，亦難相同，即令偶有相似者，亦僅偶然之現象，非盡人

意所爲。故著者主張當以中國之史前文化期互相比較。現中國之舊石器時代文化，已知有三代表者：最古爲周口店之猿人文化期（The Simianthropus Industry），最新者爲周口店之山頂洞文化期（The Upper Cave Industry），介乎二者之間者，即此河套文化期。無論由地質層序，化石及石器上之研究，皆可確定三者之前後次序。

(丙) 舊石器時代之零星發見

著者曾云：當黃土時期，因氣候關係人類曾有一部向河套遷徙。上述之「河套文化」，僅爲當時之一代表者，所佔之時間頗短，發見之區域有限。由黃土底部礫石層堆積之時起，至黃土堆積生成之後，其間爲時甚長，人類文化之演進，尙不知經過若干之程序。且河套及其附近，地域廣泛，古人類之遺址，自不僮限於水洞溝及沙拉烏蘇河二地也。茲就所知，略舉舊石器時代之發見如下：

舊石器時代之時間頗長（黃土時期僅當其中期或中期及晚期），我國所知之古人類文化尙少。將來研究之結果，尙不知如何區分，而爲若干文化期。故將此處之零星發見，另段說明。

再上述水洞溝及沙拉烏蘇河之附近，亦有舊石器時代之石器發見，因仍可歸入「河套文化」範圍內，不再重述。

(1) 河套南部及其附近 桑志華氏曾於民國九年，於甘肅慶陽之北，探有舊石器時代之石器。除前所云之黃土底部礫石層之石器外，餘均發見於黃土中。此區域之黃土，間有砂質，已不甚純粹。桑

氏發見石器之地，位於底部礫石層之上約七公尺，且與一象牙化石共生，其時代或亦相當於水洞溝者。

桑氏由此區所探之石器，均爲石英岩所製，甚爲粗糙，厚度甚大。但因標本之數目甚少，頗難知其文化特性。

(2) 河套西部及其附近 由河套西部及其附近，零星發見之舊石器時代之石器頗多，其重要區域如下：萬巴拉寺（註6），寧夏之中衛及三聖宮三地之附近。

由萬巴拉寺，桑德二氏曾探得舊石器時代之石器甚多，惟多由地面所拾得，少數由地內掘出。石器均爲風力所侵蝕，稜角處失其尖銳性。石器爲石英岩之小礫石所製，多爲石片再加修理而成。據步日耶教授之意，此處石器與水洞溝者頗相似。

由三聖宮附近，天主教諸神父及楊鍾健等，曾前後探得石器頗多，似均屬舊石器時代者，如石英岩製之扁圓器，刮削器等。此種石器亦爲風蝕，亦爲地面採集之物。但此區域，尙無新石器時代人類之遺址及遺物發見，此處石器之爲舊石器時代之產物似無疑問。此外桑志華曾於此區域中，探得一尖形石器，爲一火山石核所製，兩邊及兩面，均修理精細，頗似新石器時代之遺物，然因此區域中尙無新石器時代之遺址發見，或此石器亦當歸入舊石器時代，即晚期之舊石器時代也。

民國二十一年，德日進及楊鍾健二氏曾參加中法科學攷查團，於甘肅中衛之南，黃河西岸，發見甚多之石器及石片。發見之地層，

在砂丘之下，三門系紅土之浸蝕面之上，其地質年代當爲更新統，石器之年代當爲舊石器時代。中衛之石器，亦爲石英岩所製，多爲石片及長石片而加以修理者。此地所產之石器甚多，惜楊德三氏對其地未能多加致意，及多事採集。

(註6) 譯音，在水洞溝之北，桑氏之原文爲：Wandun sarko

(3) 河套東部及其附近 在舊準葛爾旗（即現陝西北部）及其附近諸地，除黃土底部礫石層中有石器發見外，由黃土或其相當之堆積物中，亦採有石英岩之石器頗多。如河曲縣之南，其地石器石片甚爲豐富，概爲舊石器時代人類之遺址，將來頗有重行探掘之必要。次如神水之東，永興堡附近，亦有石器發見，但此地之石器，或發見於黃土底部之礫石層中。

又如榆林附近之魚河堡，則有石器甚多，或爲古人類之工作地。此地之石器，產於砂質堆積中，與沙拉烏蘇河之河湖堆積頗相似。至吳堡附近之宋家川，更爲產舊石器時代石器之重要地點。其地有石英石器及石片堆積遍地，均在黃土階梯之上。當知其地，人類之遺址甚多，尙待將來之詳細致意。

(二) 新石器時代

(甲) 細石器文化

〔細石器文化〕(Mesolithic Culture)，分佈於滿蒙新疆一河套之史前文化

帶，爲新石器時代晚期，北方特有之文化。約在同一時期，我國中原地區，如陝甘普豫諸省，則爲具有「彩陶文化」之人類所棲止，即安特生(J. G. Anderson)氏所謂之「仰韶時期」是也。

細石器文化與彩陶文化之關係，至今尙不甚明悉。二者約以長城一帶爲界(註7)。在長城附近，二者可同發見於一地，如張家口附近之高家營子及錦縣附近之沙鍋屯。惟至今尙無人將有二種文化之地點，從事地層層序之精密研究，故二者是否有時間上之先後，現尙難有正確之答覆。

河套地方，亦爲此二種文化接觸之地，僅就地理上言之，即爲史前學研究之重要區域。茲先將細石器文化之發見地，分述如下：

(註7) 自有數處，並非以長城爲界。

(1) 沙拉烏蘇河區域

沙拉烏蘇河附近，桑德三氏除發見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外，尙有新石器時代人類之遺跡。

含舊石器時代遺物之河湖堆積之上，有黑色土，厚度不等，在草原之頂，或階梯之上部。此種黑色土中，即富有新石器時代之遺物。在舊石器時代遺址之附近，桑德三氏曾採得新石器時代之石器頗多，如：黑灰色之藍紋(?)陶片，磨光石斧，及微小之石器。此微小之石器，均爲玉髓及石髓所製，間有火石及燧石所製者。工作方法：均由極小之石核，打下小石片或細長石片，再加精細之修理工作。就石器之原料，製作之方法及石器之型式而論，爲細石器文化時代之產

物，毫無疑問。

距舊石器時代遺址稍遠之地，即河套之南部，有二新石器時代之遺址，頗為重要：一，為學羅巴爾蘇 (Boro Balgassoum)。法國神父 Mostaert 曾由其地採得甚多之石器，均為火石或石髓所製，確為細石器文化之典型標本。就中有一石製箭簇(?)，原料為石髓，三角形，下邊凹入。此種石器於林西發見甚多。二，為小橋畔。在小橋畔村之南，新石器時代之遺址甚多，遺物之多，桑志華氏為少見之地。細石器文化之細小石器，如：柱狀小石核，小長石片，小削刮器，小尖狀器及石箭簇等，無一不備，且數量甚多。較大之石器，則甚少見。石環及陶環，發見頗多，大小不等。其中工作最完美之遺物，當首推石製之小珠，大者直徑僅及四公厘，磨製光滑，鑽孔圓正。至於陶器，則皆為質地粗鬆者，其色灰黃，內含石英岩之粗粒，似為手製，外有粗藍紋，形體甚大。此種陶器，除河套區域外，尙甚少見，或因其地之原料使然。

(2) 水洞溝附近 當桑德二氏開掘水洞溝舊石器時代之遺址時，曾於黃土生成之階梯之上，採有新石器時代之遺物，如：石斧，細小之長石片，小削刮器，柱狀石核等。發見此種石器之地層，或為黃土上之黑色土，或為砂土堆積，其地質年代當在第四紀之後。至按此地之石器性質而論，此種細小之石片及石核等，當屬於細石器之文化，不容疑問。

(3) 黑龍河區域 民國二十一年時，桑志華氏重至河套，

在黑龍河附近 (橫山縣北) 發見甚多之新石器時代遺址。桑氏採集品中，有小石核，小長削刮器及小長石片等，當屬於細石器文化者。

(乙) 彩陶文化

桑志華氏於民國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時，重至河套之南部，即沙拉烏蘇河之下游，其主要之目的，為採集雷龍灣(註8)之化石。但同時桑氏發見彩陶文化之遺址，亦為桑氏在史前學重要發見之一。桑氏所採各物，尙未研究，就著者之初步觀察，可歸納其結果如下：

(註8) 雷龍灣在橫山縣之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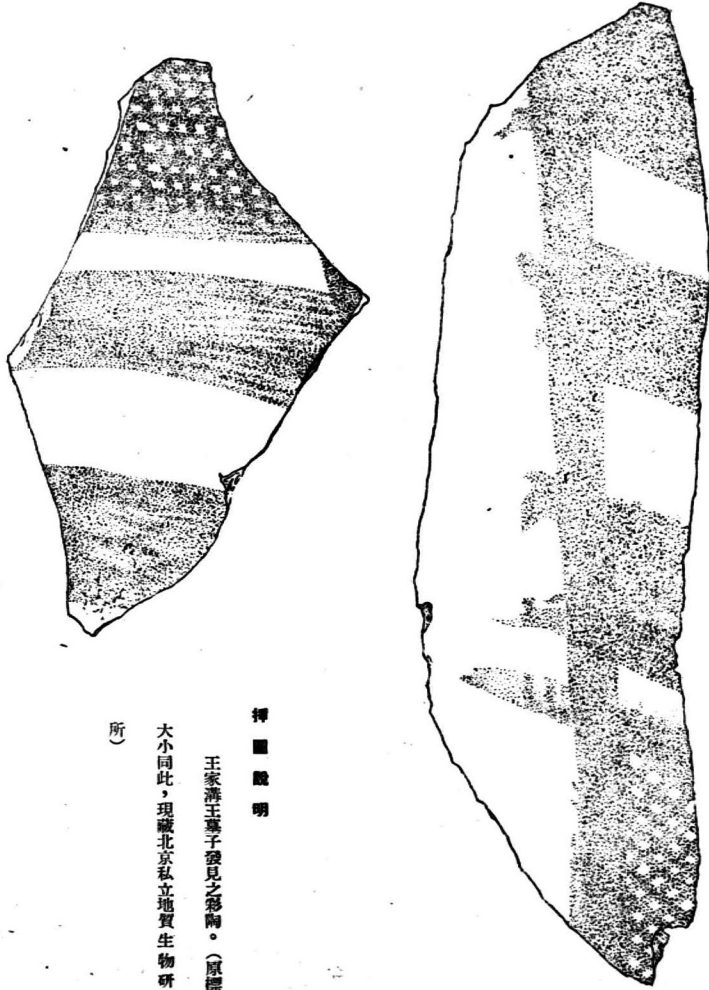
(註9) 承私立地質生物研究所長羅學賓 (Mr. T. I. Chen) 神父之善意，

將桑氏所採各物交著者研究，特此誌謝。

(1) 發見之地點

彩陶文化發見之地，皆在橫山縣西北，沙拉烏蘇河(無定河)之兩岸。重要地點，如：破碗梁，王家溝，黑水溝及乾家後河灣。前三地皆在河之右岸，僅後者在河之左岸。此四地之情形如何，所產何物，均難確知(註10)。著者之印象，約以王家溝及破碗梁二地最為重要，其遺物，確為仰韶時期者。

王家溝之史前遺址，在一圓形土丘之上，俗名「王墓子」，謂為王者之墓也。此地實為三門系紅土，受浸蝕作用，而成圓形之小山，



釋圖說明

王家灣王墓子發見之彩陶。(原標本
大小同此，現藏北京私立地質生物研究
所)

實非墳墓。其地多水流沖成之溝，仰韶時期之遺物，即發見於此種溝中。惟桑氏多採自地面，並未開掘，故其詳細地層，實不可知。

破碗梁在王家溝之東，約二十里，其地之情形，與王墓子相似。

吾人對此發見彩陶文化之地點，所當注意者，即此區域為彩陶及細石器文化接觸之地。因此區域之附近，如索羅巴爾蘇及小橋畔（見前）等地，皆有細石器文化時代之遺址。此地必為彩陶文化分佈之北緣，再北再西，則為細石器文化之區域矣。

（註10）桑氏採集之物，皆以日期記之，但同日可採多數地，不同日亦可採自同地，故頗難整理。

（2）發見之物件

由上述各仰韶時期之遺址中，所發見之遺物，尙待長時間之整理，計共主要者，為：（子）彩色陶片，如圖所示。其原料甚細，表面光滑，陶質紅褐。表面有黑褐色之紋飾，多為斜交之粗細線所組成。此種陶片常見於甘肅半山及馬廠。此外淺紅色陶片甚多，表面或光滑，或印有繩紋。灰色陶片亦有，三足器之足數目則少。

（丑）石器之中，頗堪注意者，為：小型之石斧及石鐮刀。小型石斧，長僅三公分，與著者由河南仰韶村所採者極相似。石鐮刀者，即一長方形之石板，一邊為磨製之刃，兩短邊有凹入之半圓，亦與著者在仰韶村所發見者極相似。至細小之石器則似完全未見；換言之，此河套之彩陶文化遺址，只為仰韶時期人類寄居之地，細石器文化之人類，雖在其附近，則未至其地焉。

（寅）裝飾品中，如陶環及石環等，桑氏亦採得甚多。至細石器文化常見之小珠，桑氏採集物中則缺之。

以上所述河套彩陶文化之遺址及遺物，均需詳細之研究。大規模之正式開掘，尤為重要，因非如此，實難明瞭其地層之關係，及其與細石器文化如何接觸也。

桑志華氏於河套發見彩陶文化遺物，其意義之重要有二：

（1）關係彩陶文化之分佈者——安特生及諸西洋學者，皆謂彩陶文化，發源於西方，由新疆甘肅而傳至河南，此即彩陶文化西來之說也。至中央研究院吳金鼎諸氏，則謂彩陶文化始於河南北部，次及陝甘，後至西方，此即彩陶文化起於源中國之說。因吾人現時之知識有限，實難判斷二說之是非。惟吾人之知識，與日俱增，對此問題，或可逐漸解決。桑志華氏於張家口附近之高家營子發見彩陶及細石器文化之混合遺址，又於河套之南部發見彩陶文化之遺址，使吾人知彩陶文化之分佈區域，更加擴大。若吾人將各地彩陶時期之遺物，加以更詳細之研究，或可得知器物演變之次序。若再對地理上分佈之情形，加以致查，則彩陶文化起源於何地，當可解決矣。

（2）關係彩陶及細石器文化之接觸者——前已言之，細石器文化分佈於長城以北，彩陶文化在長城之南，其時間略同，概為不同之二種民族所有。但二種文化，至其接觸之區域則如何？是否有先後之關係？或同時寄居於不同之地區？

安特生氏研究沙鍋屯之洞穴時，對此問題似不甚瞭解，故斷言沙

鍋屯爲一種文化，與仰韶時期者相同（或稍晚）。但就吾人觀察，沙鍋屯亦爲彩陶及細石器二文化接觸之地，因安氏之發見中，除彩陶碎片外，尙有打擊而成之石簇等物，則似代表細石器文化。若如此則吾人所急欲明瞭者，即沙鍋屯河中彩陶文化之人類先至乎？抑細石器文化之人類先至乎？惜沙鍋屯之洞穴堆積物似爲後世所混亂（註11），吾人非於其他相似地點（即同爲二種文化交界處）求之，實無法明瞭二種文化之接觸情形。

桑氏於河套發見之彩陶文化遺址，其附近則另有細石器文化之遺址。除一二地點，不甚清楚外，似河套南部之遺址，二種文化時期之遺物，皆不混合於一地。換言之，當時之二種民族，各據一方不相侵犯，即二種文化，無先後之分，只因地域不同耳。然桑氏在河套南部，並未作正式之開掘，此種推測，實難確信。

總之，吾人因桑氏之發見，對彩陶文化與細石器文化之關係，所知漸多，距解決之期，已逐漸接近矣。

（註11）安氏不承認此點，但據其報告，則頗似爲洞中動物（如獾狐之類）將地層翻轉使亂。

本文之重要參考書籍

西文

- Boule, M. Breuil, H., Lecomte, F., et Teilhard de Chardin, P.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Mem. 4, 1928.

河套之史前文化

Licent, E.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uangho Pailho de Tien Tsin*, 1932.

Licent, E. *Comptes-Rendus de Onze Années (1923-1933) de Séjour et d'Exploration dans le Bassin du Fleuve Jaune, du P'ai Ho, etc.*, 1936.

Licent, E. *Itinéraires Suivis dans le Bassin du Golfe du P'ai Tchenly* (1923-1933).

Teilhard de Chardin, P. *Early Man in China*.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 Géologie, No. 7, 1941.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Young, C. C.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on the Pre-Loessite and Post-Pleistocene Formations in the Western Sianasi and Northern Shensi*. Mem. Geol. Surv. China, Ser. A, No. 8, 1930.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Young, C. C. *On Some Neolithic (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gkiang and W.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 1923-23.

Young, C. C. and Pei, W. C. *On a Collection of Yangshao Cultural Remains from Mienochihsiang, Honan*.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II, 1933-1934.

中日文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蒙古細石器文化，內蒙古，長城地帶。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種第一冊，昭和十年。

裴文中：中國史前學上之重要發見，史學年報三卷二期，民國二十九年。

裴文中：史前時期之中國（未刊稿）

【筆者：師範大學地學系教授】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烏居龍藏

(一)

契丹人は東胡民族に屬し、本來は鮮卑(1)より出で、古くより潢河(Shira river)流域、その以南に游牧し(2)、隋・唐になつて其處から尙ほ南方長城附近に分布し、隋・唐と交渉關係し(3)、これが五代・北宋に至て、大に勢力を得、遂にその太祖阿保機に至て遼朝を形成したのである。それから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天祚の諸帝が繼續し、遂に次の金のために滅亡せられた。この間實に二百年存在し、その最後の歳は金の天會三年、北宋徽宗の宣和七年(西紀1125)であつた(4)(5)。

遼朝は固より契丹人自身の建立した國であることは明かであるが、その中に漢人の多くが混在して居たことを知らねばならぬ。即ち彼等は契丹人の遼朝創立以後此處に夥多しく投入し、或は契丹人の中華地掠奪の際に捕虜として伴い來りし者も頗る多く、而かもこれ等のうち智識階級の人々も尠からずあり、これ等の漢人が契丹人のためにその事業に助力したことが最も多かつた。遼朝をして斯く盛大の強國ならしめ、その文物制度をして、當時の北宋に對して敢て遜色なきまでに至らしめたのは、全く漢人が契丹人のために盡した結果であると云はねばならぬ(7)。

加之、當時東方に一文化王國を形成した渤海朝は契丹のために亡ぼされ、その結果渤海人の多數は遼國に連れ來られたから、渤海人の文化は從つてこの國に加はつた(8)、高麗國人(新羅人も)もまた此處にあつてこれを助け(9)、更に西夏・突厥・回鶻等國人もこれに加はつて居たから(10)遼代の制度・文物は實に複雑混合して居たのであるから、この點は最も注意して見ねばならぬ。遼朝は實に東北方に於て、當時特色ある一大文化圈を現出して居たのであ

る。

(1) 『後漢書』・『魏志』

(2) 契丹は「北史」「契丹傳」に現はれ(魏書にも)「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所統、竄於松漠之間。……」(『遼史』・『營衛志』)には「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僕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墟也……」

(3) 『隋書』「契丹傳」・『舊唐書』「契丹傳」・『新唐書』「契丹傳」・『五代史四夷附錄』

(4) 『遼史』・『契丹國志』・『新五代史』・『宋史』・『金史』・『高麗史』

(5) 遼は天祚帝が金の俘となり、長白山の東に遁したから、滅亡したのであるが、その繼續は全く絶えて居らず、即ち彼の耶律大石はその前年(西曆一二二四年)に西走して中央亞細亞に赴き西遼國を建て、その附近一帯を征服し、五主、八十有八年を繼續し、その領土は東は高昌附近から、西は露西亞トルキスタンにまで及んだ王國を形成し、その五主が乃蠻の屈出律に亡ぼされるまで此處で威を振つて居たのである。この國最後の歳は、實に南宋寧宗の嘉定四年(西曆一二二二)であつた。

『遼史』・『契丹國志』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6) 『遼史』の太祖紀・太宗紀・聖宗紀等、『新舊唐書』渤海傳・『高麗史』等。

(7) 漢人の契丹に於ける關係はその制度・文化の漢化するもの頗る多く、契丹の官制に北班(契丹人)・南班(漢人)の區別があるが如きその著しきものである。尙ほ考古學上の畫像石彫刻やその他に於て漢化を受けたる事實が頗る多い。

(8)・(9)・(10) 『遼史』・『契丹國志』・『殘存碑文等』

(11)

遼代に於ける契丹は、以上の如く彼等固有の文物に加ふるに他民族のそのの雜合した一種特別な文化を表現したのであるのであるが、本誌は中央亞細亞を主とする論集であるから、契丹それ自身にのみ觸れないで、茲に専ら遼代の彼等と中央亞細亞に關係する事項を考古學上から記すこととしたい。尤もこの兩者の關係は頗る多々にわたつて居つて、一度にこれを記すことは困難であるから、今は茲に先づその一つとして、契丹人と中央亞細亞、即ち西域との衣服の關係類似のみを選んでこれを記し、以て兩者の比較をして見たい。

先づ文獻の上から見ると、遼朝では、官吏として契丹人と漢人との衣服を嚴然と區別した。即ち契丹人(北班)はその固有の衣服を着用し、漢人(南班)は漢服を着用せしめた。そして契丹人の固

有衣服は皇后に至るまでこれであり、漢人は漢服であるけれども、五代の晋服を用いる事となつて居たのである。「遼史」の「輿服」の條に左の文がある(1)。

……遼國自太宗入晋之後、皇帝與兩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兩班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五代晋之遺制也。

遼の衣服に就ては、『契丹國志』の「衣服制度」の條に左の如く記して居る(2)(3)。

國母與番官皆番服、國主與漢官則漢服、番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爲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紫鞞帶以黃紅色、繡雲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簷不攝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阜、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爲貴、青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檉籜、鞣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鷄頭鴨頭爲杆腰、宋眞宗景德中、太常博士王曙戶部員郎李維往賀國主生辰、還言、國主見漢使、疆服衣冠事已、即幅巾襪蕃騎、出射獵矣。

漢人(兩班)は五代の晋服を用ゐるが、契丹人(北班)は窄袍である。この北班窄袍は、官吏のみならず、普通の契丹人も同一と見てよい。彼等の着用する窄袍は滿洲人も蒙古族は固より、ツング

ース族、トルコ族等、所謂ウラルアルタイ民族一般の着るものであつて(4)契丹人は即ちこの系統の衣服を着て居たのである。

さて以上に記した契丹人の衣服は、主として男子のそれであるが、然らば婦女は如何と云ふに、この事に對しては「遼史」や「契丹國志」等には記るされていない。けれども反對に遼の次の「金史」には契丹婦女の衣服が記るされて居る。即ち「金史」の「輿服志」の條に左の文がある(5)。

婦人服襪帶、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疊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阜及紺、直領左衽、掖縫兩旁復疊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紅黃、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阜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道遙、此皆遼服也、金亦襲之。

以上に據て見れば、金の婦女の衣服は契丹婦女の風を襲用して居るのであるから、これを以てまた契丹婦女がいかなる衣服を着て居たかが知れるのである。さうするとこの「金史」の記載は金(女直)婦女のみならず、契丹婦女の衣服の資料として斯學上最も大切な記載と云はねばならぬ。若しこの文がなかつたならば、文獻上契丹婦女の衣服がどんなであつたか、全く知られずに終つた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る。

契丹人の衣服に就ては、文獻の上からすると、先づ以上の記載にとどまつて、その他には餘り精しい資料はない。されば文獻としてはこれ等先づ満足せねばならぬ。

(1) 『遼史』卷二十四「儀衛志輿服」の條。

(2) 宋葉隆禮撰『契丹國志』卷二十三「衣服制度」の條。

(3) 洪皓『續松漠紀聞』に曰ふ「北方苦寒、故多裘皮、雖得一鼠亦製皮藏之、婦人以羔皮、帽爲飾、直十數千、敵三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也」と、これは多季苦寒の際所する衣服であるが、別にその衣服の形狀を記して居ない。

(4) ウラルアルタイ民族は皆な窄袖であつて、その材料に絹・布・毛織物・獸皮・魚皮等を以てして居る。これ等は古代に溯らないでも、今日の蒙古・ツングース・トルコ・フィン諸族等の衣服を見れば、知れるであらう。

(5) 金は前朝の遼の文物制度を模倣採用したのが頗る多かつた。然るに彼等の婦女が遼のそれをまた採用したと云ふのは、特記すべきことである。この『金史』の「輿服志」の文は、劉本項撰『遼史拾遺』卷十四にも引用して居る。

(三)

以上は文獻上に見える契丹人の衣服の記事であるが、私はこれから自分に研究した考古學上の資料から彼等の衣服を證明したい。これに就て先づ其の資料がいかなる所に在るから記るさねばならぬ。

蒙古小巴林族（現今林東縣）ワールマンハ（Warmanha）に遼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装の類似に就て

の聖宗・興宗・道宗の三陵が並列して残存する。この興宗陵内の壁面に遼の巨像の肖像が實物大に着色で夥多しく描かれ居るが、これは實に寫生と稱すべきもので、これ等人物畫の肩上に各々恰かも目筆と思はるゝ契丹文字の署名が書かれて居る(1)。またこの陵内で木偶を數個發見した(2)。滿洲の遼陽縣太子河畔石椁子一つの遼の墳墓(八角穹廬形)が残存するが、其の内部の壁面に着色で人物が十數人描かれて居る。この墓形はワールマンハの陵墓を小さくしたもので、同形である(3)。以上はすべて筆で描かれたものである。

滿洲遼陽縣内の各地には、畫像石墓が散在する。これ等は八角形で穹廬形を呈し、これもまた、ワールマンハ存在の王陵を小さくしたものであり、石椁子の遼墓ともよく似て居る。けれども畫像石墓はすべて石を組んで出來て居つて、その墓内の石壁面に種々の人物が刻せられて居て(4)彼等の文化的に中々興味あるものである。

尙ほ遼の中京城故址内、(蒙古喀喇沁中旗公爺府、寧城縣)に石人が二個殘存する(5)奉天城内から遼の開泰七年の年號を刻した石棺とともに小さな一對の石偶が二個出て居る(6)。滿洲八面城に遼代の石棺に契丹の人物を刻したのもある(7)。

以上の資料は、私が契丹人の衣服を研究する上に於て、彼等の風俗を知る頗る大切な資料で、この種の文獻に乏しい遼の衣服の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上に於て、最も参考とすべきものと云はねばならぬ。

(1) *T. O. S. P. Ching* 等の中央亞細亞壁畫中、人物の肩の上にイダル文字でその人の名を署名して居るのを見るが、這是遠代陵墓内壁畫のそれと關係があるものと思はれる。

(2) 蒙古小巴林旗(林東縣)のワールマンハは白塔子を経て、潢河に注入する白河(遼代の黑河)の上流、興安嶺系、界山にあつて、聖宗陵は中間にあり、興宗陵はその東に、道宗陵はその西にある。聖宗陵から聖宗及皇后の漢文哀册文、哀册蓋が出で、道宗陵からは漢文・契丹文の哀册文・哀册蓋が出た。興宗陵内の各室の壁面には畫色で描かれた立派な人物大の肖像畫が夥しく描かれて居る。これには北遊・南遊が明かに區別せられ、遼の衣服研究上最も大切なものである。けれどもこれ等の人物は悉く男子のみである。同陵内覆瓦の木偶はまた北遊と南遊との衣服を着して居る。これは道宗陵にももと描かれてあつたもので、その痕跡が今僅かに認められる。私は未だこれ等に就ての精密なる論文は發表しないけれども私の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出版の「考古學上より觀たる遼の文化」圖版第三冊・四冊と「國華」第四十一・九・十・十一・十二號、「滿蒙を再び探ぐる」・「遼の文化を再び探ぐる」等の拙著を参照ありたし。

尙ほ金瓶梅「遼陵石刻集錄」参照。

(3) 石學子の遼の墳墓は、ワールマンハの陵墓を縮小した形で、その壁面に人が赭紅色で描かれて居て、これ等の人物中、契丹人の婦女一

人を描いて居るから、その衣服研究上大に参考となる。

(4) 滿洲遼陽縣内各所に遼代畫像石墓が殘存する。此處は遼代の東京府の管轄地。これ等の墓形はその墳墓と同じく穹窿形で八角、鐵范片岩質の石で築かれ、その室内壁面に種々なる場面が刻せられ、これに人物を配して居る。されば這是衣服・風俗史上のみならず、遼の文化史上、頗る注意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そしてこれ等の人物には男子もあれば、婦女もあるから、大に参考にする事が出来る。私はこの畫像石墓に就て、昨年英文「遼代の畫像石墓 *Sculptured Stone Tombs of Liao Dynasty*」を出版したから讀まれたい。尙ほ私はこれに對て「滿蒙から西比利亞まで」・「滿蒙を再び探ぐる」も出版しその中にこの事があるから参照

(5) 遼の中央城址の二個の石人は、私の「考古學上より觀たる遼の文化」の圖版第四冊にあるから参照

(6) 滿洲奉天城内發見、遼の石棺には一對の小石偶がともに存在し、これは契丹男子を刻したものである。

(7) 滿洲四平街の西八面城内に一個の石棺が殘存するが、その一面に門前に二人の守衛の立つて居る所が刻せられて居る。この人物の衣服、態度は畫畫や畫像石の人物にまた見える所である(拙著「滿蒙の探查」参照)。これに似たる畫像石は遼中京故城附近にも殘存する(拙著「考古學上より觀たる遼の文化」)第四冊第三三三圖参照

(四)

契丹男子の衣服は、すでに文獻に記する如く窄袍であると
して、さてこれを考古學上から證明が出来るか云ふに、私は彼等の
先づ男子の衣服を壁畫、畫像石、その他から記して見よう。考古學
上から男子の衣服を見るに、文獻に記す如く正確に窄袍である。

そこでその一例として、茲に左に第一圖を示さう。これは契丹
男子窄袍の代表とすべきもので、這是滿洲遼陽縣白家堡子鬻峯の窟
に在る畫像石墓内に刻するものから取つた。即ち頭に縁の無い頭巾
をかぶり、衣服は窄袍(窄袍の下に襠袴を着る)で革帶をしめ帯に何
物かをつるして居り、足には長い靴を穿つ、この圖は契丹男子の衣服
として、最も代表的のものである(1)。男子は上下階級とも始んど
すべてこの窄袍で、唯だその材料や裝飾に相違があるのみである。
私はこれをA式衣服と今假に稱したい。興宗陵や石瓶子の壁畫で見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圖一第
式A服常の子男丹契
(りよ石像畫代遼)

ると窄袍には種々の色があり、冠り物にも二三の種類がある。帯は
主として革からなり、弓筒をこれに吊るして居るものもある。また
畫像石中には革帶に小刀子、砥石等を吊るして居るものもある。
然るに彼等の中に、第二圖の如きB式衣服がある。これも遼陽
縣鞍山市附近から掘出した畫像石面に刻するもので、這是即ち三人
が酒宴をす
る場面で、
中央に胡座
して盃を持
つ者は大王
で、その左
右に盃と酒
瓶を持つ者
は、王の侍



圖二第
圖の宴酒王大
(りよ石像畫代遼)

者であるが、その向つて右の侍者は婦女である(2)。

中央の大王の衣服はA式でなく、その衣服の襟の上部は恰かも今日の西洋服のやうに折り返して居る。これはA式と大に相違して居る所であつて、私はこれをB式と假に稱したい。A・B兩式のいかに異なつて居るかに注意せられたい。私は契丹男子の衣服を壁畫・畫像石その他で

多く調べたけれども、B式は唯だこの畫像石と鞍山市滿鐵苗圃内發掘畫像石(余の著書『遼代の畫像石墓』中第二四及第二六圖版)の雲上の菩薩形の人物に認められるのみで、他に一つもなかつた。さうするとこのB式は男子の着用として比較的僅少であつたやうである。

私は彼のワールマンハ遼興宗陵内に描かれた多數の人物畫を調べたが悉く男子であるが彼等は皆A式の衣服を着し一人もB式の衣服を着する者はない、斯くの如き大禮に際し彼等臣僚がA式のみ着用して居るのは、特記すべき事である。

然るに茲に注意すべきは、男子に反對し婦女の衣服は、B式である。即ち第二圖大王の向て右にある婦女の衣服はこの式である。斯くの如きB式の代表は、第三圖に示して置いた。この圖にある婦女は遼陽縣千山站の傍、千山神社境内に在る畫像石面に刻するものから取つたのである(2)。即ち頭髮を推髻の様に結び、衣服は窄袍に屬するけれども、上に兩襟を折り返した短上衣を着し、腰には



圖三第
裝服式Bの女婦丹契
(りよ石像畫代遼)

髻のある裙をつけ、足には短かい靴を穿つ。この種の衣服は尙ほ鞍山市麓から出た畫像石面にもあり(3)、鞍山市滿鐵苗圃内畫像石墓内の刻畫にもあり(4)、更に遼陽縣太子河畔石椁子の遼代墳墓内、向て左側の壁畫にもあつた(5)。この石椁子の壁畫は頗る破損して居るが、この婦女の衣服はB式らしく衣服は薄茶色で、折返した襟は赤色になつて居つて、これには縁を附けて居る。この畫は描いたもので着色もして居るから、完全なれば最も参考となるものである。

以上は私の今日にまで調べた契丹の婦女の圖像であるが、これ等が殆んどすべて、このB式であつて、這は彼の『金史』の「輿服志」に記する契丹婦女の服裝(金の婦女も襲用)とよく類似して居るのは、特記すべき所である。

然るに茲にC式もある。これは千山站附近から畫像石彫刻のキリスト降誕に際し、三人の賢者がその馬小舎に訪問する場面、小舎の前に在る彼等三人の中、向て左側に立てる一人の人物は、窄袍

の肩邊に短い肩掛を付けて居る(6)。この風は景教々師などのそれを取つたのであらうか。斯くの如き肩掛は宋代佛敎の菩薩像(女としての)などにも見る所である。この肩掛は、中央亞細亞で、波斯式翼の附いた冠をかぶる人物に見る衣服に附いて居て、和闐・ムルツク等の描畫の風俗に存在する。這是イラン的のものであらう(7)。このC式は唯だ以上の畫像石で一個見たのみであつた。

尙ほD式がある。これは遼の中京故城内に残存する人身大石人座像であつて(8)、衣服は袷を右に合せ、袖は稍や長い。そして更に衣服の上に袖の無い後は背の所から割れた胴服を着て居る。この座像は既に首部は無くなつて居るけれども、その衣裳、態度、位格、その存在する位置等から考て、遼の或皇帝の座像と假定すべき者のやうである(9)。私は未だ斯くの如き者を見たことはない。這是特別の例であらう。

尙ほ鞍山市内でもと發見せられた畫像石に(10)、彼の文姫歸漢を彫刻して居るが、その文姫の衣服はD式のやうに袷は左に合せて居るが、漢服に類似する。これは文姫が漢人であるから、かくしたのであらうか。これをまたE式とする。

契丹人の衣服は、これを要するに、彼等の一般の衣服は、男子は主としてA式であつて、稀にB式があり(11)、婦女は始んとB式と稱してよい。C式は始んど無く、D式は普通の人には無い。E式は漢服であらう。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1) 拙著英文「遼代畫像石墓」第十六圖版參照、この人物は彼の舜が歷山に耕す所の契丹服を着する舜の風俗である。畫像石に刻せられた人物は例令漢人であつても、皆な契丹服を着して居る。その手に持てるは鞭である。

(2) この畫像石は、拙著英文「遼代の畫像石墓」第三十五圖版、三十六圖版參照、これは後に記するが、圖様の場面は「サツサン王酒宴」Banquet of Sussanial King を刻したものである。

(3) 拙著英文「遼代の畫像石墓」第三十三圖版、第三十四圖版參照、この畫像石は一本の樹下に男女四人の直立する所(二人は男、二人は女)で、その中央の婦女の一人を取つた。

(4) 拙著英文「遼代の畫像石墓」第二十七圖版、第二十八圖版參照、孝子郭居夫妻とその子供三人が刻せられて居るがその夫人の衣服。

(5) 石匣子遼代墓室内に描かれた壁畫中、向て左側の一婦人で、シヤマソンの太鼓を抱ひた所の巫である。更に同室内、向て右側に描かれた一人の人物は男子で確かに童子であり、この着服は窄袍であるが、これは袷を左に合せて居る。されば這是等しくA式であるとしても、同式のHと稱すべきも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Hはこの外に見ない。契丹童子の衣服であらうか。この遼墓に就ては、私は未だこれを論文として、發表をしてない。

(6) 拙著「遼代畫像石墓」第三十一圖・第三十二圖參照。

(7)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II, pl. I XI, メンメンニイリツク發見

木板に描くもの、Le Cog「中央亞細亞藝術・文化史的圖譜」ムルツク發見插圖(第六世紀?)

(8) 東京東方文化學院出版、拙著『考古學上より觀たる遼の文化』圖譜第四册第三百二十五圖版參照

(9) 遼代では遼皇帝の御容を金・銀・銅・石等で作造し各所に御容殿を建立し、その中に安置した事があつた。此處もその跡らしく、位置は少しく高く土を盛上げ壇としたらしく、遼瓦なども散亂して居る。「遼史」卷四、聖宗統和十二年の條に「四月、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寺、飲僧」とあり、同十三年の條にも「九月、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於延壽院」とあり、また「遼史」「地理志」中に「中京大定府皇城、有顯廟景宗奉天皇帝御容殿」とある

(10) 拙著「遼代の畫像石墓」第四〇圖版・第四一圖版

(11) 契丹人男子の頭髮は、遼興宗後・峻峯その他より見ると、頭頂は圓く剃り、周圍の髮を残し、この残した髮を後頭にて合し、これを更に二つの辮髪として脊に垂れて居るのである。ボストン美術博物館所藏南宋「文姫歸漢圖」は契丹の風俗を傳叙のそれとして描いたもので參考となる。この男女の頭髮衣服、その他に注意せよ。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Portfolio of Chinese Paintings 1933 參照。私はこの中「文姫歸漢圖」の風俗は匈奴のそれは契丹人のそれを以て描いたと故服部博士紀念論文集

に記して置いた。

(五)

契丹人のB式衣服に就て、茲に最も注意すべきは、中央亞細亞の或地方に於て、嘗てこの式の衣服が行はれたことであつた。この事に就てルコツクはその著『中央亞細亞藝術・文化史的圖譜』von Le Cog: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中に同地方龜茲(Kucha)のQizil Qumtura 存在の洞穴内壁畫の人物に、この式の衣服を着ることを圖記して居る。この式の壁畫として最も有名なのは、ルコツクが殊に十六劍士洞(Höhle der sechzehn Schwertkämpfer)と號して居る所で、此處には十六人の劍士がこの衣服を着して描かれて居る。このB式衣服を同氏は襟附の上衣(Krahenock)と稱した(1)。第四圖(第七世紀)はカムツラの壁畫を取つた。この式の衣服は單に男子のみならず、當時婦女に



圖四第 宋内畫院所藏南宋文姫歸漢圖(りよクツコル)裝服子男厥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装の類似に就て

にまで着用せられた事が解せられる。

さて以上に據て考察すると、遼代の契丹人が着用したB式は元來はイランの衣服であつて、彼等が突厥回鶻の地方と接近して居た關係のみならず、互に雜合混化した影響結果として(9)、そのB式衣服を元來固有のA式衣服に對し、外國製を襲用せしものと思はれるのである。就中その契丹彫畫に見ゆる婦女の始んとすべてに近くこれを着用して居るのは、這是龜茲を始め中央亞細亞に於けるトルコ人婦女の多くこのB式を用いて居るとよく似て居るではないか。加之、金(女直)の婦女が契丹婦女のそれをまた襲用したのも、要するに畢竟そのB式が從來固有の窄袍より優美複雑に見えるからかであらうと思はれる。

讀者はよろしく、第二圖大王酒宴場面の男女、第三圖契丹婦女と第四圖第五圖の突厥男子婦女の衣服とを對照せられんことを切望する。兩者が互に類似するかを知らるるであらう。

- (1) A. von Le Coq: *Hilfen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 (2) *Le Coq S (1)* と同書
- (3) A. von Le Coq: *Chosro, A. von Le Coq: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m Mittelasien*.
- (4) A. Grünwedel: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Chinesisch-Turkestan*, A. Grünwedel: *Alt-kutscha, Archäologische und religionsge-*

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an Tempel-Gemäld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 der ersten acht Jahrhunderte nach Christi Geburt

(5) A. Stein: *Ancient Khotan*, A. Stein: *Serhdia*.

(6) P. Pelliot: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

(7) 原田淑人博士は「西域發見の繪畫に見えたる服飾の研究」中このA式B式の中央亞細亞に行はれた事を記し、殊にそのB式服飾はもとイランより來れるものと記されて居る。この文中東京東洋文庫所藏ベルリン博物館より攝影の寫眞を引用して居るが、この寫眞中、B式衣服を着するものが多くあつて、參考に供すべきである。

(8) 原田博士「唐代の服飾」

(9) 契丹と突厥回鶻との關係に就ては、(七)の結論の條で記す。

(一六)

B式の衣服が中央亞細亞に行はれ、これかもとイランのそれから出たことを證據立てるものは、實に第二圖に示す大王酒宴の場面である。そしてこの遼代畫像石には、サラセン時代に廣く行はれたサツサン酒宴の場面が彫刻せられ、これがもとサツサン時代の波斯から出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今本論文の參考としてこれを茲に尙ほ精しく記して見た。

この畫像石は、すでに(四)の條で記した如く、(この畫像石は高さ八四仙・幅一米・厚一〇仙)三人の人物の中央に座す者が大

王である。これは明かにサツサン王酒宴の所であり、この圖様は近
 東地方一帯に流行したもので、その證據は左に掲ぐる第六圖上・
 下の如きがこれであつて、這是所謂 Persian-Islamic Art で最も古
 い Islamic Period に屬するものである。第六圖の上は露西亞レ
 ングラード・ヘルミターゲ博物館所藏のサラセン時代の銀皿に彫刻
 したもの、同圖の下はまた同博物館所藏のもので、等しい時代に屬す
 る(一)。



圖 六 第

藏所館物博ゲータミルへ國露(刻彫皿製銀)圖の宴酒王大代時ソセラサ(上)

藏所館物博同(刻彫皿製銀)圖の宴酒王大代時同(下)

今試みにこの第六

圖上・下の銀皿彫刻の
 サツサン王酒宴の圖様
 を以て、滿洲鞍山の第
 二圖と比較するに、何
 と互によく類似し、共
 に同一系統の圖様であ
 ることを知るであら
 う。そして第六圖の上
 は、王の頭にトルバン
 を巻いて居るのは既に
 アラビア的となつて居
 るが、その衣服の襟を
 裏に折つて折襟をして
 居るのは、即ちB式で
 あり、手に酒壺を持て
 る所、兩側に立てる人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装の類似に就て

物は、第二圖と同一構圖である。そして同下圖は、等しく大王は手に酒盃を持ち、足を組んで胡座をなし、兩側に立てる人物は、また同一構圖である。この兩銀皿はともにサラセン時代にこれが大に好まれて裝飾圖様として行はれたことが知れる。そしてこれが更に中央亞細亞にイラン文化の波及すると共に、從てこの圖様が此處に行はるることとなつたのである(2)。

中央亞細亞に於けるこの圖様と全く同一のものは未だ發見せられて居ないが、彼のスタインが和闐で發見した木板の描圖に一人の王らしき者(四手あり)が胡座して手に盃を持つて居るのがある。這は或菩薩かと思はれるが、革帯に小刀子を附け、その有鬘や冠物から見て、決して菩薩でなく、王者らしく、そしてその圖様から見、サツサン王酒盛の場面の一つであると思はれる(3)。

この大王酒宴の圖様のサツサン朝に行はれたオリジナルのものは、下の第七圖の銀製皿の彫刻である。即ちこれは向て右に大王があり盃を手にし、その左に王妃がありともに毛氈の上に座し、その側に侍者があり、また二足の猿が音楽を奏して居る。大王の頭髮、折襟の衣服その他は中央亞細亞に行はれたB式のそれと同一のものである(4)。猿のこれに伴つて居るのは、和闐發見の猿の音楽を奏して居る土偶にもある(5)。尙ほサツサン時代銀皿に彫刻する一人の馬上騎士の圖は(6)、その頭髮、折襟衣服、腰に附けた籠・馬の鬘の縛り方等は龜茲、その他にも延て要用せられた

ことが分るのである(7)。

尙ほ

この圖様は印度にまでも行はれ、即ち彼のアジャンタ第一洞窟にも描かれて居る(Griethに據る)

これは一人の大王が座して手に盃を持ち、その左右に三人の侍者が同王に酒瓶を持ち酒を注がんとして居り、また王の前に二人の侍者が皿に飲食を盛り捧げて居る。この圖はツツセ(Touches: Scene de Bacchante)はコストラウのサツサン王バルウエズ二世(西紀580—628)の酒宴の場面と解して居る。さうすると、この圖様は印度にまで行



第七圖
サツサン時代銀製彫刻大同大酒宴の圖
(リョクツコル)

はれた事が窺はれるのである(8)。

以上の圖様は更に東遷して契丹に波及した事が考察せられるのである。斯く記して来ると、滿洲鞍山の畫像石は、その圖様の上から契丹と中央亞細亞、延いてはサラセン・サツサンと直接または間接影響のあつた事が證明せらるるであらう。尙ほよく鞍山畫像石の描刻に注意してみると、その大王の冠はサツサン式のもので、向て右に立てる女の冠物はサツサンや中央亞細亞の壁畫の人物の冠物でサツサン式のもので、原田博士の所謂鷄頭狀の冠であらう(9)。この冠をいただく圖は和闐の壁畫にある(10)。

中央亞細亞を経て、イラン的色彩の契丹に及ぼせる影響は、單に彼等の畫像石彫刻畫を以てしても以上サツサン王酒宴の圖様のみならず、尙ほネストリアン教に於けるキリスト降誕の場面や(11)、聖樹(Sacred tree)(12)等の場面等があつて、これ等はともに併せて研究すべきものと思はれる。

(1) Ernst Cohn-Wiener: Das Kunstgewerbe des Ostens.

(2) この圖様はサツサン朝極盛の時から、好まれたもので、これがサラセン朝になつても、その王その他の貴族等と同一狀態の酒宴が行はれて居たら、尙ほ引き續いてこの圖様が流行し、更にこれが、イラン文化の波及とともに中央亞細亞にもこれが流行したのである。

(3)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4) Le Coq「中央亞細亞藝術・文化史的圖譜」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5) 狼の音楽を奏する土偶は、和闐等中央亞細亞地方から發見せらる。ルコック、スタイン等の著書にもある。這はもとイランの影響である。

第二圖滿洲鞍山畫像石の大王酒宴の場面の向て左に座して酒瓶を保持する男は、その顔形は普通の人と相異し恰かも猿面の如く見ゆ、若し假にこれを猿とせば、サツサン酒宴に猿の出で居るのは、全く同じ事となる。參考までに附記す。

(6) Le Coq「中央亞細亞藝術・文化史的圖譜」に第三十六圖として掲げて居る。

(7) Le Coq 同書、圖を略す。

(8) Le Coq 同書、圖を略す。

(9) 原田博士「西域發見の繪畫に見えたる服飾の研究」

(10) M. A. Stein: Ancient Khotan.

(11) 拙著「遼代の畫像石墓」第三十一圖版、第三十二圖版、参照

(12) 拙著遼代の畫像石墓第三十四圖版参照。これは Sacred tree, Tree of life, Gaeahlgatal tree などと稱する種類である。

(七)

以上の如く契丹人にイラン的B式衣服の着用せられたのは、既に記す如く、這は古くは突厥、續て回鶻との接觸、混化の影響より來て居るのである。契丹人は隋、唐の時代に於ては早くも突厥と大

に關係し、或時は彼等に征服せられ、その臣とさえなつた事もあつた(一)されば契丹と突厥と古來深き關係のあつたのは、固よりである。

然るに、遼代に至て契丹が隆盛、強勢を呈するや、世は回鶻は突厥と代り、この時は反て回鶻は契丹に服従するに至り、遼朝に朝貢する禮を取つた位であつた(2)。これを以て見ても隋唐時代から遼の強國時代を通じて、中央亞細亞の彼等と交通、往來等の盛んにあつた事は、よく知られるであらう(3)。

契丹人と突厥人、回鶻人との關係は、單にその土地の接近、往來等のみにとどまらず、契丹人の土地に彼等が雜住し(4)互に結婚すらし居たのである。この著しい例は、彼の遼太祖阿保機の皇后滔欲、述律氏の如きは、その先は回鶻人である(5)遼の皇后名稱は契丹語「舞幹麗」であるが、突厥語の「可敦」をさえ用ひるやうになつて居た位である(6)その他官名に突厥語を使用してゐたのみならず(7)その文字も契丹文字、漢字のみならず、突厥回鶻文字も使用せられて居たのであつた(8)。

以上の如くであるから、遼代に突厥から回鶻を通じて中央亞細亞諸國と大に關係があつた事は固より明かだ、這は延いて契丹人が當時中央亞細亞に於ける突厥——回鶻の間に着用せらるるB式衣服のまた此處に流行して着用せられたのは自然の結果と云はねばならぬ。そして私の既に記す如くこのB式衣服はA式窄袍よりも複雑、

優美であるからこれが行はるるやうになつたものと思はれる。這はサツサンからサラセンに、サラセンから突厥——回鶻に、更にまた延て契丹にまで及んだのである。尙ほ況んや金の婦女すらもこれを契丹から襲用するに至つたのであつた。

B式衣服の遼代に行はれたのみならず、畫像石の圖樣等に於ける考古學上の事實より考察すると、遼代には相當中央亞細亞を通じて例へこれがトルコ民族よりとしても、這は明かにイラン化であつて、當時契丹人の間にその物質文化のみならず、精神文化(説話等)もともに影響して居たのである。この理由から遼代契丹研究は中央亞細亞やイラン文化との比較研究を忘れてはならない。

(1) 『舊唐書』、『新唐書』の「契丹傳」に突厥との關係を記する事頗る多く、或時は「本臣突厥」とする位であつた。更に契丹の西南に隣接して居た奚の如きは、契丹よりも突厥化を受ける所が頗る多く、奚は全く突厥の臣として服従して居たのであるから、契丹に於ける突厥化はまた奚から來て居るであらう。奚の事は新舊「唐書」「隋書」等に見える所である。

(2) 『遼史』卷七十「屬國表」を見ても、突厥、回鶻を主として、中央亞細亞の敦煌、于闐、高昌その他の諸國との往來朝貢は頗る頻繁であつた。「契丹國志」記載「諸小國貢進物件」中に「高昌國、龜茲國、于闐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涼州」の名をづらね「已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餘人至契丹貢賦」と附記し、その

買獻の物は「玉珠・犀・乳香・琥珀・珊瑚・瑪瑙・寶鏡兵器・斜合黒皮・黒黒絲・門得絲・怕里呵・楊里絲・已王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爲疋」であり、「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として居る。

『遼史』の「地理志」上京道の條に上京都城内に「……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とあり、これに據て見ても、回鶻人は當時遼都城内に商販をして居たから、その物貨は此處に輸入されて居たのである。

(3) 當時の交通往來は、中央亞細亞のみならず、波斯、大食までに及んで居た。『遼史』によると、太祖天贊二年六月に「波斯來貢」とある。大食はサラセン帝國で『遼史』によると、「天贊三年九月癸亥大食國來貢」、聖宗開泰九年壬寅「大食國遣使進象及方物、爲子册刺請婚」とある。これを以て見ても當時中央亞細亞のみならず、波斯・アラビアのイラン地方とも互に關係した事が知れる。

(4) 『欽定熱河志』卷九十七「古蹟」の條に回紇城として斯く記して居る。即ち「在平泉州境內、金史太宗紀都朶朶克高恩回紇三城、進取中京、則城當與高恩二州相近、蓋遼時存回鶻部人居此、故以名城也、今無考。」これで見ると遼の中京府内に回紇城があつて彼等の仔虜を連れ來り一城をなしたことが分る。

(5) 『遼史』「列傳」后妃の條、太祖の皇后述律氏に就て「太祖潛欲皇后、述律氏、諱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鶻人、縡思生魏寧舍利、魏

寧生縡思梅里、縡思生縡結梅里、縡結娶烏德烈王女、生后于契丹……」と記す。これに據て見れば、當時契丹人と彼等回鶻の雜住して居たことが窺れるのであつて、契丹上流社會に彼等の血が混じて居ることがこの一例によつて想像が出来る。

(6) 『遼史』の「列傳」皇妃傳の最初に「……遼因突厥、稱皇后、曰可敦、國語謂之厥俾斡、韋稱曰稱贊慶、蓋以配后土、而母之云……」とあり、また『遼史』の「國語解」には、「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式里塞 遼皇后之稱』とある。「稱贊慶 慶亦作改稱贊、后土稱慶母稱」とあるまた同史「百官志」の條に「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縡思縡結梅里、未詳何職」とある。

(7) 『遼史』の「國語解」世表に「俛斤 突厥官名」とある。

(8) 『遼史』太祖紀的天贊三年九月の條に「甲子詔豐潤遇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とある。これで突厥文字の契丹に古くから行はれて居たことが分る。その歳の同月癸亥には大食國即ちサラセン國の來貢の記事があり、またこの月に「回鶻糶里來貢」、多十月には「丁卯軍于霸難思山、遣兵臨洮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またその十一月には「乙未、朔、遷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過、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射虎于烏刺都里山、抵霸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とあり、當時契丹人の得意思ふべきである。

契丹と中央亞細亞との服裝の類似に就て

乾燥亞細亞一角的語言系統

錢端義

討論到乾燥亞細亞西南角上的語言系統，主要也就是研究阿剌伯語 (Arabic)，波斯語 (Persian)，和土耳其語 (Turkish) 的歸屬。研究這語言的系統，就要連帶到種種引證的語言。因此就會遇到語言學上的種種重要問題。若不解決這種問題，就不能論及乾燥亞細亞語言系統問題的核心。

阿剌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的系統各不相同，而今日都用阿剌伯文字寫，並且在宗教上，歷史上都有很深的關係，所以外表相似的地方很多。語彙的借用，文法的同化都很多，甚至不解此三語者不能分別其異同。然而詳細觀察，就會知道其間的根本差別。例如「父親給孩子一本書」這一句話，這三種語言的說法各不相同：

阿剌伯文語 'Aṭ-ṭalāh kitāban 'iḥ-iwālāhī.

波斯文語 Peter be-piser jak kitābra. dad.

土耳其文語 Peter oğla bir kitabı verdi.

其中三語共同的語彙是 Kitāb，意即「書」，原是阿剌伯語。波斯土耳其語共同的語彙是 Peter，意為「父」，是波斯語。語彙的借用，由此也可知其甚。再比較三語的文法，語彙的排列，更可知三語的根

本差別了。依各語語彙的排列順序，可譯成下列三句：

阿剌伯語 (他) 給，冠詞，父 (主格)，書 (賓格)，與格介詞，冠詞，孩子。

波斯語 父，與格介詞，孩子，一本，書 (賓格)，(他) 給。

土耳其語 父，孩子，與格助詞，一本，書，(他) 給。

三種語言的外形雖極相近似，但其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來了。

再說這三語言在亞細亞的西南角上是最有勢力的。各有一方的勢力。阿剌伯語在宗教，波斯語在文學上，土耳其語在政治上，各有支配當地民衆的勢力。因此歐洲有志研究東洋學的人，大體首先就要研究這三種語言。

這三種語言是當地最有勢力的語言，同時也是當地三大語言系統的代表。大體說，在亞細亞西南角地方通行的多數語言沒有跳出這三系統的。阿剌伯語代表閃語系 (Semitic Language)，波斯語代表印度歐羅巴語系 (Indo-European Language)，土耳其語代表土耳其語系。

可恩 (Marcel Cohen) 將閃語分成東西兩派，西派又分西南與西北兩語群。閃語的共同特徵是所謂三音基語。一語的根本概念是用一定順序排列的輔音表示的，這就是基語。而閃語大體都是用三個輔音，所以稱爲三音基語。例如輔音 qd 表示「殺」的根本概念。其間插入種種不同的元音，可以表示「殺」的各種伸延出來的意義。

東閃語派的語言現在知道的只有阿迦特語 (Akkadian)。這是古代巴比倫 (Babylonia) 和阿叙利 (Assyria) 通用的，因亦有阿叙利巴比倫語 (Assyro-Babylonian) 之稱。此語歷史可以追溯到紀元前三八〇〇乃至三六〇〇年的時代。但自從巴比倫滅亡 (前五二六) 以後，阿拉美語 (Aramaic) 即取而代之。於是阿迦特語就只存於宗教上，直到紀元初，還用爲宗教語言。

西北閃語包括兩種語言單位：迦南語 (Canaanite) 和阿拉美語 (Aramaic)。迦南語總括腓尼基語 (Phoenician) 和希伯來語 (Hebrew)。此外還有古代迦南語也屬此類。

腓尼基語通用於亞細亞地中海沿岸地方，又渡海而侵至北非卡塔格 (Carthage) 及其左近的地方。以其遺存的碑文，推到紀元前第九世紀。但因其完全不記元音，所以不能解。在亞細亞，紀元第一世紀就完全爲阿拉美語 (Aramaic) 所侵，但是卡塔格地方卻保存到第四世紀。殖民地的腓尼基語亦有部尼克 (Punic) 之稱。

希伯來語通行於巴勒士登 (Palestine)。主要是靠舊約聖書而傳至今日。最古的遺跡說是紀元前二千年以上的時代。紀元前五世紀

乾燥亞細亞一角的語言系統

中葉，文稿始見完成，但是在口頭上已經開始現有衰落之狀。在紀元前第三世紀聖經的希伯來語，後代聖經用語 (Post-Biblical or Mishnaic Hebrew) 已不相同了。當時用以講道的語言就是這後代聖用語。

希伯來法典 (Hebrew Torah) 中第一篇是米那 (Mishna)，這篇所用的文字就稱米那希伯來語 (Mishnaic Hebrew)。這是紀元第一一二世紀用的語言。由中世至現代，希伯來語與阿拉美語混合，而通用於猶太講法博士 (Rabbis) 之間。這情形正和天主教徒 (Catholic) 的拉丁文一樣。現今巴勒士登內外的猶太極民主義者 (Zionist) 都主張復興希伯來語，作爲口述語言 (Spoken Language)。在第六第七世紀猶太聖書編纂者 (Masoretes) 試行填補經文中的元音，但是他們填補的元音是否古時的讀法還是疑問。

阿拉美語以多數方言形式存於阿迦特語 (Akkadian) 以東，環繞着希伯來語和腓尼基語。最盛時代是三〇〇至六五〇年間。當時曾奪取了阿迦特語 (Akkadian) 腓尼基語 (Phoenician) 和希伯來語的地位。今日所謂新阿拉美語 (Neo-Aramaic) 或新叙利亞語 (Neo-Syriac) 只通行於約二十萬人的口頭，其餘都用阿剌伯語了。

西南閃語主要是阿剌伯語和亞比西尼亞語 (Ethiopic)。阿剌伯語又有種種。在阿剌伯北部發掘了紀元前第二一二世紀的碑文。解讀了是利希語 (Lihyanite)，和正統阿剌伯語有極親近的關係。正統阿剌伯語是在中央阿剌伯，碑文形式的最古記錄也不比紀元第四世紀更早。在這時期阿剌伯文語興盛起來了。還是回教詩以前

的阿剌伯語。和麥迦 (Mecca) 方言要素混合的就是這語言，也就是寫可蘭經 (Koran) 的語言。可蘭經是穆罕默德 (Mohammed) 講道的彙集教本，在第七世紀寫的。可蘭經的用語是古典文語，不是大眾口頭的語言。而在歷史上卻是一種重要的筆頭文字 (Written Language)。在文學上非常豐富的。用語也有確鑿的地方，文體也頗有一貫的精神。同時在語言形態上，措辭上有很多微細的紛亂地方。在筆頭上至今還不失其地位。不僅如此，穆罕默德的教徒外出布教的時候，可蘭經的語言也一定隨同出去的。穆罕默德時代中央阿剌伯地方的口頭語，現在是沒法推測的。今日亞細亞和阿非利加有三千萬人用的各種阿剌伯語都各不相同，不能互通的。但由文法上來觀察，現代阿剌伯語是很簡單而且是分析性的 (analytic)。南阿剌伯語和正統阿剌伯語也有近親的關係。所知道的碑文是紀元前第八至第六世紀的。在文學上都沒有別的伸展。今日在阿剌伯東南的幾處地方還通用。

所謂亞比西尼亞語 (Ethiopic) 是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通用的閃語系的語言。或是阿剌伯沒有擴張勢力的時候已由南部阿剌伯輸入了。這是南阿剌伯語和含語系 (Hamitic) 的方言合成的語言。有古代的方言蓋斯語 (Gez)，今日亞比西尼亞基督教文學上還用。現代通行的幾種方言中，阿姆哈拉方言 (Amharic) 最屬重要。紀元十三世紀就也用於筆頭，作為公文用語或宮廷語言。

波斯語是印度歐羅巴語系中的依蘭語言 (Iranian)。依蘭語又有古代中代及現代三種形式。

古代依蘭語始於紀元前第四世紀。其遺存的宗教文獻中所用的語言可分兩種方言。一種是古代波斯語，是宮廷用語。另一種是宗教上的用語，稱亞維斯 (Avestan) 亦稱善德 (Zend)。古代波斯語是西依蘭語，達里歐 (Darius) 一世至阿塔塞爾塞 (Artaxerxes) 時代的楔形文字傳承下來的。亞維斯是波斯國古經 Zend-Avesta 的用語。但最早是始於薩散 (Saasandae) 王朝時代，在紀元二二六至六四一之間。嚴格說，Avesta 是波斯教主 Zoroaster 的經文用語。而 Zend 實是在中代波斯語的譯文和註釋。但是近來這兩名稱常常亂用，甚而有兩名詞運用而稱 Zend-Avesta，所指即 Avesta 用的古代依蘭語。Zend 雖是用中代波斯語的譯註，但文章寫得很早，頗多古形，例如其中的詩歌篇 Gathas 就有大部古風的特色。

中代依蘭語的遺跡最早也已在紀元以後，而語言上有相當早期的特色。一般認為是紀元前第四世紀至紀元第七世紀的語言。所謂柏拉維 (Pahlavi) 就是古代波斯語楔形文字轉變出來的方言。其他中代依蘭語的遺跡，最近發見的，有索古得方言 (Sogdian Dialect) 和薩迦方言 (Saka Dialect)。

現代依蘭語的主要代表就是現代波斯語，就是柏拉維 (Pahlavi) 直系後裔。在史跡上，最初見於第九世紀，漸漸成為豐富的文學語言。差不多布滿了依蘭語言的全境，並且都沒有很大的變異。受阿剌伯語的影響很大，借用的阿剌伯語彙也非常多。

除去今日的波斯語以外，還有各種主要的依蘭語方言，通行於裡

海 (Caspian Sea) 沿岸，及中央亞細亞的東南地方。其主要者可舉裡海方言，古的方言 (Kurdish)，俾路支方言 (Baluchi Dialect)，帕米爾方言 (Pamir Dialect)，阿富汗方言 (Afghan Dialect)，雅諾方言 (Yagnobi) 和奧塞方言 (Ossetic)。奧塞語通行於高加索地方，約一萬七千人的口頭。而他們的周圍都完全不是依蘭系統的語言。

土耳其語 (Turkic) 一般和蒙古語 (Mongolic)，通古斯語 (Tungusic) 同歸於阿爾泰語群 (Altaic)。這三種語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音韻組織上，在語彙的構成上，在語句的結構上都有共同的特徵，但是在形態上都不同。元音調和在各方言中都有，但各不相同。雖然相同的現象很多，但至今還不能明確證實其間的系統關係。只看表面上的相同，是不足以斷定這語言是出於同源的。不同系的語言也會互受影響，也會混入他語的成分。有了這種情形，當然也就發生同樣的現象。這三種語言歸成阿爾泰語言，是以地勢情形而定的。所謂土耳其語包含種種方言；大體數來，也有二十餘種。所布的地積也極廣大，跨占歐亞兩大陸。在歐洲，不僅是土耳其鄰近的地方，遠達克里米半島 (Crimea)，裡海 (Caspian Sea)，窩瓦河 (Volga)，喀馬河 (Kama) 流域等地。在亞洲，由小亞細亞伸張到中國新疆省。

南方和波斯，阿富汗，西藏相接，北方界線在多木斯克 (Tomsk) 以北，由托波爾斯克 (Tobolsk) 直達葉尼塞河 (Yenisei)。這河的西方是通古斯語的界線。再向北去，在西伯利亞 (Siberia) 有耶古特 (Yakut) 人的地域，這地通行的另一種土耳其方言。正統的土耳其語常稱鄂德曼 (Ottoman) 或鄂絲曼 (Osmanli)。這是歐洲亞洲兩地土耳其人的語言，和一切方言特色不同的有兩種方言：其一就是耶古特 (Yakut)，另一方言是朱梵須 (Chuvash)，通行於窩瓦河 (Volga) 和喀馬河 (Kama) 交接地方。最早的遺跡是紀元前七三四年時用北歐古文字 (Runiform) 刻的碑文。其他遺存的文字證明各方言自十一世紀以來，並沒有什麼變化。土耳其語的遺跡，除去古代的宗教經文以外，在十四世紀以前，沒有文學上的遺存，語言上頗受外界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主要是受阿剌伯語和波斯語的影響。以後歐洲語言的感化甚行。在人種上，地域上都比較雜亂，設立語系的問題尚須今後的研究。現在暫認爲土耳其語系，也似無不可。

(此文多參考東洋思潮，松本重喜氏西南亞細亞之言語系統)

[筆者：北京大學國語教授]

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壤地已與新疆西界相接。大年（咸豐元年）

中國許俄商至伊犁及塔爾巴哈台兩處通商，於是中俄之間，又有經濟利益之關係。俄人佔領西伯利亞之過程，至爲迅速，而於中央亞細亞之進行，則較爲遲慢。當阿古柏入新疆時，俄阿接壤之地實亦已多，而俄人此時最注意者則爲伊犁之通商利益。俄阿之間終至釀成衝突，則由：（一）俄人對阿之不承認或強硬政策，（二）中亞各國之仇視俄人及阿古柏私通中亞之嫌疑，（三）阿古柏與英人之來往。自阿古柏對俄表示不讓步，及與英國通使以後，俄人對阿即取嚴厲態度，一方令浩罕古德耶爾汗（Khudayar Khan）攻阿古柏，不遂；一方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以馬賊逃匿爲詞，進取伊犁，向南疆取包圍進攻之勢（註三）。

（註三）新疆圖志，卷一百十六，兵事部。

當伊犁初陷於土回之時，清廷曾擬以借用英兵平太平天國先例，倡借俄兵平回亂，俄人立即允諾。但以政策關係，因循未果。伊犁既陷之六年中，俄人對於新疆一切因亂事所造成之局面，皆堅持不干涉與不承認主義，則爲事實。一方面由於俄人對阿古柏及其他造亂者無良好之感情，一方面則以新疆當時法律上猶爲吾國領土（註四）。俄人當日對於我國尚有所顧忌，而其後之決取伊犁者，則端因俄人深信中國無力收復天山南北路。中央亞細亞之疆原爲非自然，難以防守，不若乘中國兵力不足時加以修正，佔領伊犁形勢，爲牽制阿古柏之上策，而以保商業，尤爲切要（註五）。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註四）A Great Britain Paper by Command 大英政府公報，1873 卷七

五 英駐俄公使致首相書。

（註五）蔣廷黻：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中卷第十章，引論，頁二〇四。

俄國佔領伊犁以後之初步交涉，即電其駐京公使，告清廷俄人不過暫代中國管理伊犁。一面要求先解決中俄之間懸案，然後交涉伊犁，一面則冠冕堂皇，聲稱中國勢力如能達到伊犁，一定交還。是爲同治十年秋間（一八七二）（註六）。俟清廷派烏里雅蘇台大員榮全往接收，俄人則抗不交，俄人雖明諒中國無力收復，一方面又懼此事或在可能之刻，故必須更進一步，以謀繼續或延長回疆之亂事；使退還伊犁之條件，永無實現之日，可以永不履行交還之義務。以此之故，自取得伊犁後，俄人對於阿古柏即反前此恐嚇壓迫之態度，而一變而爲親善，所以那翼扶持之者，幾於無所不至。是爲俄阿感情最融洽之時期，而厥後情勢又復改變，則由於英阿關係之接近。

（註六）參看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十二，八十七，八十八，九十三，請節。

十九世紀英俄兩國在近東與中東之衝突，爲吾人所習知，惟此種衝突之局面，實爲英國與亞洲回教各國共同對俄之衝突。蓋俄國所侵略之亞洲國家，皆爲回教國家；其對俄之利害，每與英國相同，英人輒從而袒護之。而回教國家，對英之關係，大體上亦較良好，故常有聯英者。阿古柏爲回教徒，又感俄人之威脅，自不外此。故俄阿訂

四一

約，阿古柏又取對俄疏遠，對英接近之政策。一八七三年，英人以費普斯爲全權大使，與阿古柏訂約，予英人以優越之權利；又與土耳其成立協解，又防俄商入新，爲阿古柏全盛時代。次年俄國要求援英先例，駐領事回疆，阿竟不允，且進而侮謾俄人。俄人大憤，決議討伐，集大軍備餉械以待，卒以浩罕內亂，不暇東顧，阿始幸免。而是時中國已平定陝甘回亂，中亞局面又非昔比矣。

二、左宗棠之收復新疆

回疆獨立之始，爲陝甘新疆東于回民之變；及太平捻苗次第平滅，陝甘回亂繼而敎定。此種原因既經消滅，回疆爲清廷領土之一部，自必進一步而消滅此種獨立。惟欲達此種目的，亦有困難數種：

(一) 大亂初平，度支非常困難；(二) 陝甘回亂平後，叛黨如白彥虎等，皆竄新疆，與阿古柏聯成一氣，其勢力更大，其鬥志更決；(三) 新疆遠處邊陲，交通不便，且英俄態度極其曖昧，更爲困難之處。當時朝士，方主大事海防之議，欲集財力以赴之；海防塞防二者不可得全，頗有主棄地，移西征之餉以助海防者。李鴻章之奏疏可爲代表(註七)。李謂欲圖振作，必統天下全局。新疆無論開闢之難，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尙三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地，而增千百百年之漏卮，已爲不值；且其地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其天方波斯諸國，南近英屬之印度，即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久守。曾國藩尙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今雖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能逮。應將已經出塞及尙

未及出塞，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停撤之餉均作海防之餉。朝臣疆吏多贊其議，郭嵩燾爲當時外交見解最爲通達之人，亦主張新疆封阿古柏爲外藩之說，而左宗棠則力排衆議，堅持用力收復，而以爲事爲可成而首要。

(註七)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頁十八至十九。

文襄之意，以爲從來中國邊患西北劇於東南，清朝從都燕京，其所以蔽捍燕京者，則爲東三省與蒙古；而新疆則所以保蒙古，斷不可落於強鄰之手。海防之急並不倍於塞防，而疆事之餉並不裕於海防，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寸，不獨疆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文襄果上剴摺象施，縹緲兼籌之策，且慷慨發言，臣一介書生，高位顯爵爲平生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觀望恩施？況年已六十有五，日暮途長，乃不自付量，妄引邊荒鉅觀爲己任，雖至愚極陋，亦不至此(註八)。於是用兵之議始決。

(註八) 參看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六。

光緒元年，清廷以左爲欽差大臣督辦西征軍務，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陝西巡撫譚鍾麟督西征餉事。光緒二年二月，文襄由蘭州啓行，凡帶有馬步四十四營及金順馬步十營。當時交通不便，餉糧不足，困苦異常，自不待言。軍事之經過，無庸贅述。當西征動員時，俄人對於中國似頗表示同情。原以俄人之助阿古柏，本欲助長回亂以復中國無法收復伊犁；今中國既有肅清內亂之能力，阿又不見好於俄人，俄

縱有助中國消滅阿古柏以得中國好感之意。故當清軍初出關時，俄人遂將糧食售供中國（註九）。至於英人之態度，則惟恐中國消滅阿古柏，取消其在回疆已得之政治經濟諸權利。且阿古柏對於英人，自始至終皆非常良好，故在文襄未由蘭州啓行時，英人即調令其駐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代阿古柏向清廷乞情，請保全領土，許其稱藩，事為清廷所拒。一方面則英人又派若干軍事教官入新，代阿古柏訓練軍隊，並給軍火，以期增厚阿之抵抗力，然亦終屬無用。蓋自光緒三年清軍南進後，不及一月，達坂城，托克遜及吐魯番皆相繼陷落矣。吐魯番收復後，西征軍事事實上殆已結束，以後收復南路殆為手續上之問題，並無困難。自此至喀什于闐收復，其第一重要之事，則為阿古柏之自盡，次為其二子因爭權而鬩牆，三為英人央請吾國駐英公使郭嵩瀾及調令威妥瑪再度為阿古柏之子請求允許立藩。惟當時收復南疆為清廷已立計劃，所請自無結果。至光緒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南疆遂全為清軍所收復，回疆獨立乃告消滅，中俄伊犁問題，乃轉入兩國間正面之交涉。

（註九）左文襄稿中屢提及。

三、崇厚之出使俄國

南路平定後，總理衙門向俄使布策（Feldin Butow）交涉交還伊犁事宜，俄使不許，旋回本國；清廷乃派崇厚為全權大臣，赴俄交涉。當時總理衙門所以派遣崇厚之故，蓋以其前在著北洋大臣任內，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頗得外人歡心，且曾出使法國，代表政府為天津教案道歉，於外交更為熟手。崇厚既以洋務得名，遂為士大夫階級所不喜，其中又有黨派之關係。蓋崇厚之被任，其議出於沈桂芬（註十）。沈為軍機領袖，外交政策主持重，軍機中李鴻藻、翁同龢等皆與之不合。沈薦崇厚時，翁即不贊成，謂此去必辱君命。沈謂其官至一品，家資數百萬，必自愛惜。翁謂惟其愛惜，所以不可；雖不欺君賣國，必至愛生畏死（註十一）。李鴻藻援引清流，亦不贊成沈之軟弱外交。崇厚初受命時，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即摘其行程不應由海路赴俄，應從新疆出發，身歷其地體察大勢，與左宗棠定議而後行（註十二）。蓋崇厚方出國時，各方即有頹言；使其外交辦理完善，恐尚難逃於清議，而崇厚到俄後之交涉，則實有荒謬之處。

（註十）見林紓：鐵甯瑣記；歐陽昱：見聞隨錄。

（註十一）見聞隨錄。

（註十二）調子集奏議，卷一，頁六十三至六十四。

崇厚出使所奉之使命為：（一）接收伊犁，（二）要求引渡白彥虎，（三）無論如何訂約須得北京許可。崇厚過法時，駐法公使曾紀澤與之談話，對之亦殊不滿意。崇厚到俄，總署又予以訓令，不許預失政治及經濟利權。光緒五年又有訓令，必須條約辦理完竣方可回國。七月中，崇厚報告條約大綱，謂俄國不能引渡白彥虎；八月中，謂至北海簽字；二十日，謂已簽字，運自回國（註十三）。蓋受俄人之威嚇，漫加應允，故所訂之約，殊草率也。

(註十三) 參看清季外交史料，卷十五，卷十六。

崇厚與俄國所訂條約之內容爲：(一)俄國允還伊犁，(二)中國恩赦伊犁居民，(三)伊犁民人遷居俄國者，准照俄人看待，(四)俄人在伊犁置有財產，准其照舊營業，(五)中國允還俄國收守伊犁各費五百萬，(六)接收伊犁後，陳爾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直斯河歸俄屬，(七)塔城界址稍移，(八)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現准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設領事，(九)俄商在蒙古天山南北路貿易均不納稅，(十)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走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此約結果，中國得一虛名孤立於極邊之伊犁，而損失經濟利益及土地疆界兼重。條約送至總理衙門，諸大臣認爲如此收還伊犁與不收同，或尙不如不收之爲愈(註十四)。奏請飭下李左諸人審議辦理。李鴻章認爲崇厚所訂之約，確屬不當；但條約業已訂就，崇厚出使又奉有全權便宜行事字樣，又不能翻改。此約行之雖有後患，若不允行，後患更亟。必須軍餉充裕，足資控禦，乃可毅然爲之。惟一希望崇厚當日曾告俄人，各事必依批准方能舉辦，或有活動之法，須俟崇厚回國，密與詳詢，體察情勢，俟換約時將界務，商防，加以酌改(註十五)。左宗棠聞之，自殊憤慨，以其辛苦所經營，爲其輕易所破壞，且得勝之餘，更增自信之力。故主張毀約重議，謂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腕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陣，擊忍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似，敢不勉旃？又謂武事不虛之秋，有割地

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道，乃遽議捐棄要地，要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猶不止。目前之患且然，異日之憂何極！(註十六)此爲崇厚尙未回國時，大臣意見之不同。

(註十四)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六，頁二十五至二十八。

(註十五)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頁十五至十九。

(註十六) 左文襄公奏稿，卷五十五，頁三十三至四十一。

四、和戰問題之爭論

崇厚所訂條約內容，既經發表，朝中譁然。清流黨羣起痛斥崇厚，主張毀約備戰。清流黨者，光緒初年官中敢言直諫，以國事爲己任，指斥權貴，議論朝政，以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黃體芳，實廷，鄧承修諸人最負時望，李鴻藻實陸支援之。及外交問題發生，更爲發言之良機，諸人皆少年文人政治家，所謂士大夫階級而講求時務者，於崇厚之喪權辱國，抨擊自不遺餘力。

翰林院侍講學士黃體芳首劾崇厚，不忠不敬，乞重治其罪，上諭以崇厚讓約章程及總理衙門歷次所奏摺下廷議(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註十七)。詹事府右庶子張之洞上長疏論之，爲當時最負盛名之作，可以代表清流之主張。張疏歷指約中不可許之種種理由：陸路通商，東三省根本之地，不收稅課，蒙古台站，商人帶軍器，設領事官，割險要之地等。謂俄人索之，可謂至貪至橫；崇厚允之，可謂至醜至愚；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雖使臣，下廷議，可謂至明至斷。因

言改議之道，曰計決，曰氣盛，曰理長，曰謀定，而終於則出一戰。謂：無論我之禦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而料俄人雖五戰不能越嘉峪關，三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舉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且謂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以戰；若再閱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漸盡，欲戰未能矣（註十八）。

（註十七） 清季外交史料卷十，頁九至十。

（註十八） 張文襄公奏稿，卷二，頁一至四。

清廷於是初定崇厚斬監候，派駐法公使曾紀澤赴俄重議新約，備戰之論調甚高，言官上書者數十人。沈桂芬雖欲祖護崇厚，李鴻章亦之甚力（註十九）。太后意亦主戰（註二十）。李鴻章則不贊成作戰，謂左帥主戰，倡率一班書生腐官，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而政府畏清議甚，明知其難，又不能不為細駁（註二十一）。劉坤一亦評左帥主戰為扭於滿腹之役，自謂作戰實無把握（註二十二）。於清流所議亦不贊成。

（註十九） 閻爾昌：碑傳集補。

（註二十） 潤子集書讀，翁文恭日記。

（註二十一） 李文忠公全集奏劄微函續，卷十九。

（註二十二） 劉忠誠公書牘，卷八，頁二十六至三十九。

備戰之中，清廷特電請英將戈登（George Gordon）來華，襄助平太平天國者，將份以爲長城者。戈登爲李鴻章舊部，而此舉殊非李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所願也。戈登抵華後，與政府諸人議戰事。謂戰固可而戰，但中國須遷都，用游擊戰術；長期抗戰，清室帝位亦將不保（註二十三）。清廷聞之沮喪，戰議遂寢，乃專意於條約之挽回。

（註二十三） 參看 Boulser, Life of Gordon, 及 C. G. Gordon and H. Marten-artery, Nov. 2nd, 1860.

當崇厚定罪時，英使威安現（Thomas Wade）法使寶海（F. A. Bourca）均爲之請寬免其罪，願助力中國改議條約；罪使臣，則對俄將成僵局，難以轉圜也。崇厚奉旨蒙恩赦免，仍牢固監禁，使條約議妥，再行加恩。挽回條約之重責，乃加於曾紀澤之身。

五、曾紀澤之挽回成約

曾紀澤外交之成功，宜爲近代史上所當大書特書者。蓋以中國國勢衰弱，帝俄虎視眈眈，已訂成約；譬如置肉其口，安能索還？崇厚地位爲全權大使，而會則爲公使，尤有言輕之患。國內又主戰主和議論，稍不成功，身敗名裂，將益有甚於崇厚。曾爲文正公國藩之子，襲侯，奉使英法兩國，平昔於中西學皆有根底，通達時務；既奉令不獲已，即對於問題之焦點，有明確之分析。會認爲此次交涉，有三大問題：一爲邊界，二爲通商，三爲賠償。應斟酌其中之輕重權宜，方有交涉之步驟。應以邊界爲最要，伊犁一地，乃中國之奧區，不但爲西域之門戶，保伊犁所以保新疆，特克斯河流域之收回尤爲重要，此在萬所必爭者。至於通商條約則在其次，蓋商約非一成不變者，日後

向可因時修改。且新疆擬開通商之市，此時戰後，瘡痍未復，俄人亦不易急於發展，故不如界約之重要。至於賠款，更為末節。賠款僅為儀式，款亦無多，不妨應許。崇厚所訂條約，未從皇帝批准，尚無法律上效力，固不必訴之武力也（註二十四）。

（註二十四）會惠徵公文集奏議，卷二；文集，卷四。

當時外交輿論可分三派：清流一派為重說理而略於形勢者，李鴻章一派為顧形勢而不尚高論者，此二派可稱為革命之外交與病夫之外交；曾則理勢兼顧者。曾公使聘英人馬格里（Marsden）法人日意格（Giquet）為隨員，備顧問，先使二人在英法二國作外交活動。此時英國之外交政策，反對俄國在中央亞細亞經營，形勢於俄不利；法對此種問題本無趣味，惟憐俄國不牽心於東方，能以專力注意歐洲問題，聯合制止德國之獨霸。故英法二國均願贊助曾氏改約之舉。紀澤至俄，派馬格里往見駐俄英使德佛佛（Dufferin），德氏即詳告以應付俄國外交部吉爾斯（Giers）等之手段。謂彼等必以厲色相待，無須介意，文之總可轉圜。俄人所注意者，邊界要案數件必須速辦，以平其心，而顯中國和好之意，一也。崇罪必須赦免，且須斟酌措詞，二也。曾地位為二等公使，較為減色，三也。此皆吉爾斯所言，德意第三項不關重要，前二條務為注意。此為英人所授之策略，曾乃急電總理請辦（註二十五）。

（註二十五）會惠徵公文集，卷四頁五。

曾交涉時，俄外交部甚為強硬。既欲宣戰，又令其具贖言明永不

索還伊犁等，幾經阻碍。後俄皇自聖海還都，諭令外部無使中國為難，於無可讓中，再行設法退讓，外部始不復固執前議。費時蓋踰七月，光緒七年重訂聖彼得堡條約，俄國之所以讓步，由於俄土戰爭方畢，不欲再有舉動也。

聖彼得堡條約之內容：（甲）關於分界者：（一）伊犁西南部收回（特立斯，兼額克新河均收），（二）喀什噶爾界線重勘，（三）塔爾巴哈台重勘；（乙）關於通商者：（一）臺灣關通商仿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刪去不提，（二）松花江通行取銷，（三）領事僅設吐魯番，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四）天山南北路暫不納稅；（丙）償款，代收伊犁費九百萬盧布（五百萬兩）。約中除償款增多外，凡崇厚所損失利權，完全收回。德佛佛謂從來外交家未有能使俄國放棄其已得之權利，而會能之，實為可佩（註二十六）。摩爾斯論曾氏外交之勝利，為中國空前之勝利。前此中國固有武力之勝利，而折衝樽俎，不操兵刃如曾氏者乃為首創（註二十七）。可以見其難能可貴者矣。

（註二十六）Houlger, *Holladay Marsden*, p. 261.

（註二十七）H. H.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p. 379.

原夫曾氏之所以勝利，乃由其識見明達，洞悉國際形勢，而善利用之。曾亦明知俄方新經戰役，不欲再戰，英法諸強，均能予以精神援助，自處於不敗之地位。交涉之步驟，則爭所必爭，不爭所不必爭，故其收穫，有異於常人。抑國內主戰空氣之濃厚，雖不為曾本人所喜，而亦足以為其後盾。伊犁問題，遂告一結束。

（筆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明代西茶易馬考

李光壁

王圻續通考云：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邊境，省戍守

費。是茶市之設，實爲明人邊境之一種政治策略。蓋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所謂以備山之利，易充靡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中國害，中國得馬，實爲馬政軍需之資，且可制馭西番，不敢騷擾邊境矣。

明興之初，軍事旁午，兵用馬匹，類皆仰給於邊塞種族。王世貞市馬考序曰：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爲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於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自是馬漸充實矣。

此爲茶市未開前之情形。考明初馬匹來源，尙不止於收買，亦有以各處土官衙門秋糧，折納馬匹者。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刑政云：

國初各處土官衙門秋糧，各依原認數目，折納馬匹。有糧二十五石有餘折馬一匹者，有五十餘石折馬一匹者。起解到部，令獸醫

明代西茶易馬考

辨驗明白，具奏送御馬監交收。馬或不堪，責令差來土官陪納。後土官糴馬，多就近輸納，或以折色，無復解京者。其四夷進貢馬匹，即於各衛所依缺缺馬官軍騎操。

收買之法，亦不專以茶易馬，皇明世法錄刑政云：

收買之法，或以茶，或以鹽，或以互市，或以價銀。洪武間，官給價鈔於各處收買，並茶易到馬匹，或就彼給軍，或解京交納，令屬部知其數。及永樂初，乃開市於遼東，正統初，又中鹽於靈州。其流漸廣，今茶法通行，而互市亦不止遼東矣。

是茶法之外，尙有互市中鹽之制。中鹽之制，正統三年，以靈州鹽課，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馬給軍騎征（註一）。互市之制，始於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以絹布易馬。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絹三疋，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爲市。此後互市馬價，迭有變更，不及縷述。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註二）。

四七

不久亦罷。隆慶五年，北虜納款，請開馬市，議准宣大山西三鎮，許各開市，每年請發兵部馬價，並本鎮糧册，及節省各餉銀內動支買貨備市，六十年來，邊境粗安。直至崇禎間用兵套虜，三鎮款市遂絕，此所謂互市不止遼東也。今茲所論，在於以茶易馬之制。

註一 嘉明世法錄輯政。

註二 明史食貨志茶法。

二

洪武四年十二月，令采漢中茶以易馬。欽定續文獻通考禮茶云：戶部嘗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處茶園共四十五頃七十二畝，茶八十六萬四千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一分，其民所收茶，官給直買之。無主者令守城軍士壅堵。及時採取，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軍取其二。每茶五十斤爲一包，二包爲一引，令有司收貯於西番易馬，從之（註一）。

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沱河雅諸州，自犏門鞏雅抵梁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註二）。

洪武八年，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嚴從備殊城周容錄卷十吐蕃：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綉帛並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

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

洪武中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覓茶。降金牌信符，賜番族以防詐僞。沱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上號在內府收貯，易時賣驗。每三年一遣廷臣，詔各番合符以應納。差發馬交納易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

太祖以邊吏不獨縱放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國課不充，且或假朝旨橫索番馬，致其悻悻，侮慢朝廷。但謂羌戎不順，豈知激之有自。故製金牌信符，其文曰皇帝聖旨差發納馬，不信者斬。特命曹國公李景隆實往吐蕃。令各蕃族認辨馬課，別各置一牌藏於大內。每三年遣使賣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絕奸欺。王世貞奔山掌別集市馬考云：

洪武三十一年，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蕃。先是命景隆實金符往西番易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至是還，命分給京衛騎上操養。

太祖又恐邊衛巡防不嚴，私茶漏於境外，勅兵部傳諭守邊者知之，兵部進禁約事宜。遣人持諭川陝衛所，仍遣西僧管者藏卜等往吐蕃中諭之。當時茶禁甚嚴，即貴戚犯者亦不少貨，殊城周容錄云：

初駙馬都尉歐陽倫遣其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關於吐蕃，倚勢放

橫，滿聞大臣皆畏威承順，不敢違忤。時四月（洪武三十年）農方耕種，倫通使陝西令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暴，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捶河橋巡檢司吏，吏不能堪，奏其事。上大怒，賜倫死。以布政司官不言，並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官，遣使查實嘉勞告者。

按倫尙安慶公主，高皇后所生也。當時行法之嚴如此。

復考明代以茶易馬之制，官茶之外，尙招商中茶。官商之茶，皆貯邊易馬。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其例如下：（註三）

茶 馬 司

陝西 瀧州 永樂九年 洪武七年

河州 永樂九年 洪武七年

西寧 洪武三十年 正統八年 嘉靖四十二年 復建

四川

驛門

批驗茶引所

陝西

徽州 永樂六年設於火頭嶺，嘉靖三十六年改移白龙江附近，置驛三

茶 課 數

陝西茶課，初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二斤一十五兩五錢，弘治十八

明代西茶易馬考

年新增二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斤，共五萬一千二十六斤一十五兩五錢。

四川茶課，初一百萬斤，後減爲八十四萬三千六十斤。

凡引由，洪武初議定。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即爲私茶。凡犯私茶者與私鹽同罪。又定凡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元，照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納銅錢六百元，照茶六十斤，易馬之制，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三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附近蕃族，將運去茶易馬，原額牌四十一面。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蕃，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河州必理衛二州七站西蕃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先期於四川徵茶一百萬斤，官軍轉運各茶馬司。洪武二十二年，定茶易馬，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註四）。直至永樂四年，停止茶馬金牌。至宣德時復給之，未幾番人爲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给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殊城周密錄云：

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夫不充，將漢中府歲辦之數，並巡獲私茶以易馬。其於遠地，一切停止。至

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爲吐魯番所奪，屢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我地，須閉關絕其貿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難病死耳。殊不知貿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彼安得不救也。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于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爲其所掠也。

至此爲明茶政衰微時代，直至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推調各番，興復茶政，始有法度之可言。

註一 此種徵課之制，以後迭有變更，參閱大明會典茶課。

註二 明史食貨志茶法及明會典茶課。

註三 明會典茶課。

註四 明史食貨志茶法及明會典茶課。

二二

楊一清字應寧，其先雲南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携之居巴陵，少能文，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久之，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饒爽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略，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註一）。顧一清整飭茶法馬政事，明史志傳均語焉不詳，本傳云：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廢弛，人多挾私茶闖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籠茶

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而於其規劃詳情，則未道及。案一清經營籌劃之策，今具見於所存奏疏中，亦弘治間茶法馬政上重要之史料也。一清規劃之策要有多端，茲擇奏疏，條述如下：

一曰增種馬：溯自永樂四年，以陝西地宜畜牧，乃詔開設監苑，其始規畫，亦甚宏遠。苑馬寺所轄六監曰威武監，同川監，照春監，順寧監，長樂監，靈武監。蓋亦跨陝西數郡二千餘里之地，後皆革去，止存長樂靈武二監。一清既受命督理馬政，遂遍歷兩監及所屬六苑，酌量軍額多寡，戶口盈縮，測知各苑養馬之數，恐不能盡如舊日之額，遂上疏云：（註二）

臣今遍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前項苑分，恐不能盡如原定養馬之數……通計六苑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三邊之用，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遽難收效。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虧折馬匹，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勾前數。二曰增牧軍：一清疏云：（註三）

切照陝西苑馬寺兩監六苑，原額養馬恩隊軍人共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七百四十五名。在逃事故等項四百七十五名，縱使勾補完足，數亦不多。若不增置牧軍，則善養之人，難收蕃息之效。共改革辦法，爲發充恩軍，補增牧軍。疏請：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

法司問擬人犯，有例該邊衛永遠充軍者，俱發各苑，永遠牧馬。種馬既多，牧軍亦增，華息自然漸繁，昔日之盛，自可期矣。

三曰重苑僕卿貳之官：人存而後政舉，任法亦當任人。茶馬之弊，亦由於任人不當之故，案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卿少卿等官，比與兩京太僕寺，原自相同，後來士大夫重內輕外，又見兩寺無權，遂爲遷人請宣之地。欲修馬政，首當重苑寺官選，故一清疏云：（註四）

數十年來，士大夫重內輕外，又見兩寺衙門無權，多不樂爲。用人者因而俯就之，凡遇缺員，苟取充數，積習既久，遂爲遷人請宣之地，人人得而輕之。……爲今之計，慎擇卿寺官員最爲急務，今前項卿少卿員缺，若不遴奉明旨，照在京太僕寺官例推用，則無以轉移人心。若以遷議視之，則其勢自輕，人以推擢視之，則其勢自重，耳目一新，士氣自倍，人人得自展布，馬政不日可復國初之盛矣。

四曰修建營房城堡：一清疏云：（註五）

看得陝西苑馬寺各苑，多不曾修建衙門城堡，及雖有城堡，年久塌塌。又皆無營房馬廄，苑官多儲屋而居，或宿窯洞，所養官馬，晝夜在野，且春夏之時，趁水草牧放，固可適其騰遊之性；至於多寒時月，若不蓄積草墊，攢槽餵養，山野之中，草枯水凍。加以風雪侵凌，凍餓損傷，寧不致死？

故處置馬營城堡，誠爲急務。當時修建之情形亦具見於奏疏中：

臣已委布按二司等官，勸得長樂監廣寧開城黑水三苑，俱在平涼

明代西茶馬易考

府固原州地方。安定苑坐落鞏昌府通渭縣地方，靈武監清平苑坐落平涼府固原州地方，萬安苑坐落固原州及慶陽府環縣地方，前項城堡量其大小，各修城門一二座，城上修壕牆更舖以備瞭望，四圍各潯城壕於內，隨其地勢廣狹，各修營房馬廄，多者數百間，少者百十餘間。開立衛市，以通貿易。春夏時月，如無聲息，官馬聽其在野牧放，一有烽火傳報，即便收聚回營。及冬春寒凍時月，俱收入城堡餵養。

觀一清之所經劃，築城堡則人馬有所保障，置馬廄則馬匹不至橫傷，修營房則實軍有所依棲，皆施政之善者也。

以上之數項施設，皆見諸施行，頗奏實效，此事可於其總奏修理馬政疏証之：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荷蒙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與馬政，係是一事，該兵部題奉欽依，將巡茶御史（註六）取回，命臣兼理茶馬。今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廄羅列，孳牧之規，稽考之法，粗皆就緒。

惟當時對於招番一節，雖坐收茶馬之利，實未嘗復金牌之制。舊制每三年一次，欽遣近臣，賞犒金牌，公同鎮守三司等官，統領官軍，深入番境剽營，調聚番夷，比對金牌字號，收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如有拖欠之數，次年催收。價茶先期由四川軍民，運赴陝西接界去處，交與陝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納。轉輸數千里，所費不貲，自

宣德正統以來，邊方多事，陝西軍民，轉輸軍餉，無暇運茶，腹裏衛分官軍又各調去甘涼寧夏等處征操，別無官軍可調，茶馬因是停止。六十餘年，與諸番通不相通，金牌之制，莫之能復。一清至是題請復金牌之制（註七）。終以金牌久廢，卒不能復。故不復詳述之。

註一 明史稿一清傳。

註二 皇明經世文編稿一清爲修舉馬政疏。

註三 同上。

註四 皇明經世文編稿一清爲邊成命重聘寺官員以修馬政事。

註五 皇明經世文編稿一清爲處置馬營城舉事疏。

註六 案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茶馬，成化三年合差御史一員巡茶，十一年取回巡茶御史，十四年乃差御史巡茶。

註七 皇明經世文編有稿一清爲修復茶馬舊制以撫番夷安靖地方事疏可參閱。

四

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註一）。嘉靖十五年，御史劉良卿上疏請整飭茶政，頗切中時弊，其言曰：（註二）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備邊；然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茶。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

歐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查開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洩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今茶司居民物易香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

於是奏准重通番之律，每年易馬當發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復責兵備各選官防守嚴加察備，於是茶法稍飭矣。嘉靖三十年，詔給西番諸侯勘合。先是二十八年，御史劉嵩請復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祇給承承殊損國體，至是總督尙書王以旗亦以爲言，下兵部議，遂定以勘合代金牌之制。王世貞弁山堂別集市馬考載兵部議論甚詳，錄一段如下：

部覆國初制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侯，令鉗制其黨，納差發馬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爲北虜所據，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散失漸復遷使內地，密邇三衛，遂不復有舊符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時，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金牌給番，本爲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爲命，不得茶病且死矣，嚴私販之禁，則不撫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則在我無以繫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每歲以是爲驗，使彼族屬無統者易於號召，而於文移則革去交易之名。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至於授職承襲，必勘合類奏而後許之，則恩威兼濟，諸夷可風矣。詔如擬。

季刊 中央亞細亞

神宗萬曆五年，俺答請開茶市勿許，欽定續文獻通考雜茶云：

請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之，貽惠匪細，部議給百餘錠而勿許其市易。

可見明代始終以茶市爲制馭西番之資，故不許北廣互市也。惟至末季，政治廢弛，茶法馬政，方與邊防俱壞。明史食貨志茶法云：

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姦孽日生，泊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給

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賄，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

下也。番得茶販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

註一 明史食貨志茶法。

註二 同上。

【筆者：北京大學文學院講師】

創刊號目錄（民國三十一年七月）

- 中央亞細亞概觀……………王 謨
- 烏梁海邊區之概況與素阿特人……………祥 伯
- 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馮承鈞
- 新疆之史前考古……………裴文中
- 唐鏡文中之西方意匠……………姚 鑒
- 西藏種族沿革地理考……………張法隱
- 西北沿邊圖籍志……………龍 曠

第一卷 目錄（民國三十一年十月）

- 西藏之氣候與農作物……………蔣丙然
- 西藏宗教研究……………周長海
- 文頤藏政策及處理……………陳吐設卡案之始末……………庚 年
- 敦煌俗文學之發見及其展開……………傅芸子
- 漢武伐大宛考釋……………周建平
- 散氏盤爲氏羌族器考……………柯昌濟
- 新疆鑛源及其重要性（上）……………尹樂心
- 西北沿邊圖籍志（一續）……………龍 曠

第二卷 目錄（民國三十二年一月）

- 古代希臘人關於中亞和中國的知識……………吳祥麟
- 黃帝與堯之傳說及其地望……………孫作雲
- 漢代文物的西漸……………姚 鑒
- 中央亞細亞概觀（續完）……………王 謨
- 新疆二魚之記載……………張春霖
- 新疆鑛源及其重要性（下）……………尹樂心
- 西藏教育鳥瞰……………青 麟

編後記

在和煦的春光中，本刊又將出與人相見了。回顧本刊前後已出四期，也有了一年小小的歷史。在本刊創編之初，本業於東西學者對於中央亞細亞都會有很好的成績貢獻於世；就是我國自身，從清末以來也有許多學者孜孜於這方面的研究；從前西北研究的雜誌頗極一時之盛，不幸今皆停頓，我們關心西北或中央亞細亞的人，心中不免要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寂寞。所以不揣冒昧，想試着編輯一個刊物，希冀繼續前人的成績。雖然我們知道在現在的中國，學者既難覓，材料也已散逸，想要繼續研究一些甚麼，是非常困難的。但我們總不忍視那蓬勃的研究，就這樣荒蕪下去。所以我們雖屢經磨難，但總盡着力量，來謀計維持這樣的一個研究氛圍。我們不敢企望把他作得那大，只有本着把他作好的心，一步一步試着走下去。幸而一年來，承各方面的愛護，讓我們這刊物能漸漸成長起來，這是我們編輯人非常引以為慶幸，而且不能不感禱的。我們最快樂的是像李長傅先生那樣遠居南京的人，也肯寄稿讓我們刊登，這鼓舞起我們莫大的勇氣，使我們益覺此後須堅忍從事，以期不負各方面愛護的盛意。

這次承日本顯學的島居龍藏博士賜以宏文，讓我們感到無上的光榮。同時在溝通中日文化一點上說，這也許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些研究的借鑒，更鼓勵我國自己的研究。本此意義今後更希望日本甚至各國的學者，都能時時加以愛護，賜文刊登，藉以促進我們自己的興趣。

裴文中先生這次為我們特意寫了一篇河套的史前文化，介紹了許多新資料。關於彩陶及細石器的問題，恐怕與西方或所謂「歐亞北方」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又其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接觸地帶，當如裴先生所指出即在長城地帶。這些問題都急待闡明，承裴先生加以系統的介紹，尚望讀者注意。

最後錢端義、陳爾初、李光燾三先生都在百忙中，承為撰稿，也是我們非常感謝的。

在這應幸與感禱的心情中，我們編輯人也不敢不培植自己的學識，常常關心到中央亞細亞的各種書籍。不幸當最近讀到某書時，竟會發現到本刊第一期張仰之、細僧氏的一文，是直襲此書的。我們愧自己編輯時的不慎，但為學術的真實起見，不能不希望今後不再遇見這樣的事。不然這不單徒然欺騙了讀者及編者，而且對於作者自己的學識既無裨進，並損傷了他自己的人格。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接受外稿。
- 二 稿件標準如下：
 - 甲 關於中央亞細亞之學術研究及調查。所包括之地域為新疆，甘肅，青海，寧夏，西藏，西康，內外蒙古及蘇聯領中央亞細亞諸國。
 - 乙 可供中央亞細亞之調查研究作為參考資料者。
- 三 來稿文體不拘；但須繕寫清楚，附加新式標點。稿末並應註明投稿人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四 來稿經發表後，由本會酌致現金為酬，每千字五元起計算。其價值特殊者，得另洽優待辦法。投稿人却酬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因性質不合或其他理由不能登載時，由本會負責退還；並附贈近期本刊一冊，以答雅意。
- 六 來稿請逕寄北京南池子四十七號中央亞細亞協會編輯部。

中央亞細亞 第二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姚

北京南池子四十七號

鑒

發行所

中央亞細亞協會編輯部

北京南池子四十七號

印刷所

武

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一七

目	價
中央亞細亞	一年出四期
每卷四期	定價四元(郵費在內)
每期一冊	(國內國外一律)
	定價壹圓(郵費在內)
	(國內國外一律)

注意：本刊論著未經同意時不許轉載或翻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中 央 亞 細 亞 協 會 發 行